

抗戰建國叢書第三種

革命領袖權

浙江省抗日自衛委員會戰時教育文化事業委員會編印



革命領導權

目次

革命領導權

上編

一、建國責任之前瞻	葉溯中(一一——一九)	(11 — 19)
二、一個領袖一個主義	茹春浦(二〇——二三)	(20 — 23)
三、一黨政治與中國	葉青(二四——三四)	(24 — 34)
四、黨派問題平議	黃旭初(三五——三七)	(35 — 37)
五、我們對於黨派問題的意見	陶百川(三八——四三)	(38 — 43)
六、統一抗戰與階級問題	羅敦偉(四四——五二)	(44 — 52)
七、張國燾脫黨問題之我觀	徐詠平(五三——六〇)	(53 — 60)
八、國家社會黨與中國青年黨公開以後	周洪山(六一——六五)	(61 — 65)

頁數

MG
D69374
327
2

目次



3 1797 7910 7

下編

- 一、蔣委員長對於中國共產黨宣言的談話 (六六——六七)
- 二、中國共產黨宣言 (六八——七一)
- 三、張國燾敬告國人書 (七二——八三)
- 四、中華民族革命同盟解散宣言 (八四——八五)
- 五、國家社會黨張君勳致蔣汪總裁函 (八六——九〇)
- 六、蔣汪總裁覆張君勳函 (九一——)
- 七、中國青年黨左舜生致蔣汪總裁函 (九二——九三)
- 八、蔣汪總裁覆左舜生函 (九四——)
- 九、京滬蘇浙旅居武漢文化界同人對時局共同意見 (九五——一〇〇)

1130

R4341

革命領導權

革命領導權

革命領導權，是一個革命政黨在革命的途中，本其革命的主義與政綱，領導民衆，共同奮鬥，以完成其革命使命與任務，並對其他各黨各派居於領導地位的一種權力。

此種革命領導權的獲得，不是偶然的，而是歷史所賦予的，環境所必然產生的。否則，革命就缺乏了中心，革命的目的便不能完成。

中國在這偉大的時代與非常的環境之下，中國國民黨便是負起了革命領導權，力求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政黨，這是一個極顯著的事實。因爲：

第一：我們從各黨各派的要求與行動上來觀察，自蘆溝

橋事變發生，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陰謀更爲深刻化表面化以後，中國共產黨首先在去年九月廿二日公開宣言，其中表示的態度，有四點值得注意：（一）澈底的爲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二）放棄暴動政策，摒絕赤化運動，（三）取消蘇維埃組織，（四）改編紅軍爲國民革命軍，受軍事委員會之統轄。在這宣言裏，很可以看出中國共產黨一個極重要的轉變，就是服從中國國民黨的領導。

接着中國共產黨宣言之後，十月二十五日，就有李濟琛，陳銘樞等所組織的中華民族革命同盟解散宣言，在這宣言裏說：「自蘆溝橋及上海事變發生後，全國在 蔣委員長領導之下，毅然作自衛神聖之戰爭，我民族已呈現空前未有之

統一。……故於八月發表宣言號召國內外盟員及全國同胞全體動員，各盡其力，擁護政府，抗戰到底，復於十月二十五日經最高會議議決，正式解散中華民族革命同盟之組織」。這種光明坦白的表示，很顯明的是受中國國民黨之感召所致

再看本年四月十三日，國家社會黨張君勵致蔣汪正副總裁函中有：「……可知同人等之主張與中山先生民族權民生之三大主義措詞容有不同，而精神則並無一致」。又說：「今日強寇方張僭竊潛起之際，尤當追隨公等之後，鞏固主權，保全國土，使中華民國長保昔日之光榮，且得今後之自由發展」

本年四月二十一日中國青年黨左舜生亦致函蔣汪正副總裁，函中有云：「國民黨最近所發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及抗戰建國綱領，同人等曾詳細閱讀，並以極端之善意迎之。」又謂：「中山先生謂三民主義爲救國主義，如公等認同人等夙所主張無背於救國之原則，俾同人等十五年來所慘淡經營之一集團，在抗戰建國過程中得盡其最善之努力，庶於國家前途能有較大之貢獻」。從國家社會黨、中國青年黨的兩函中，亦顯示着他們均誠摯的接受中國國民黨之領導。這決不是偶然的事。

所以從中國各黨各派的要求與行動上觀察，革命領導權，只有中國國民黨才能負擔得起。

第二：我們再從中國近代史上觀察，只有中國國民黨一向是負担着革命領導權的責任。中國國民黨的前身，是一八九四年的興中會，至一九〇五年改名爲同盟會，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再改名爲國民黨，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又名爲中華革命黨，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復名爲國民黨，自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改組後始稱今名——中國國民黨。

回憶中國國民黨在這過去的幾個階段中，『興中會』時代，以民族革命爲號召，『同盟會』時代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爲主張，與滿清末年的保國會、政聞會，憲友會，憲政實進會，辛亥俱樂部等；及民初

之共和黨，統一黨，民主黨等各政黨的主張相比較要進步，革命得多。辛亥革命之推翻滿清，是出於國民黨的領導。民二、三的倒袁運動，護法戰爭，及民十五的出師北伐，完成統一，以及今日的抗日戰爭，無一不是由於中國國民黨所領導的。從『興中會』時代直到現在的國民黨，在中國近代史上握有革命領導權的時間，差不多已有四十多年。在這四十年中，國民黨的命運，雖時受折磨，屢遭艱危；國民黨的形體，雖時而分裂，時而合併，時而改組，可是精神上總是始終如一，奮鬥不懈，在總理大無畏精神之感召下，本其一貫主義，不屈不撓地向前邁進；自民十三而後，由於組織之益趨嚴密，力量之益趨集中，與國人之熱烈擁護，更日益

發揚廣大起來，終於掃蕩軍閥，完成北伐，掌握政權，統一中國，成爲中國唯一的革命政黨。其他許多的政黨，不是自生自滅，便是退伍落後，這就是證明只有中國國民黨在歷史的過程中能負擔得起革命領導權。

第三：我們再從目前事實的需要上觀察，覺得亦只有中國國民黨負擔得起革命領導權，這原因，由於第一，國民黨有最賢明最偉大的領袖。蔣總裁非但是國民黨的領袖，也是全國同胞所共認的惟一的最高領袖，領袖的苦心孤詣與任勞任怨，使全國上下均服從其指揮，從事抗戰建國工作；第二，三民主義實已深入於人心，我民族對外鬥爭力量之強烈，更當倍蓰於往昔，凡我國民，莫不自信我偉大之民族，決

無被敵滅亡或屈服之理；第二 在中國的軍事上，政治上，財政上，祇有國民黨有支配的權力，國民黨臨全代會宣言及抗戰建國綱領，非但是各黨各派所一致接受而為共同努力之準繩，並且是全國民衆（除漢奸外）所一致要求實現的。

革命領導權，就好像三岔路口的一塊指路牌，一部機器的發動機，它能夠指示你的去路，向着康莊大道前進；它能發揮中樞的作用，集中力量，完成它最大的使命。

我們要求獨立！要求自由！要求生存！惟有全國一致遵從中國國民黨的領導，努力抗戰！努力建國！我們有了這個與中華民族解放運動始終不相分離的革命政黨，有了這個博大精深、偉大的三民主義，有了這個堅強有力的統一政府，

並且有了數十年爲國民革命不斷奮鬥的最高領袖，我們相信，最後勝利必屬於我！民族的自由的獨立的國家必能建設完成！

中國國民黨抗戰建國綱領

(甲) 總則

- 一、確定三民主義暨總理遺教爲一般抗戰行動及建國之最高準繩
- 二、全國抗戰力量應在本黨及 蔣委員長領導之下集中全力奮勵邁進

革命領導權上編

一、建國責任之前瞻

葉溯中

中國當前的最大問題，是抗敵建國。

去年十二月十五日，京滬蘇浙旅居武漢文化界同人所發表「對時局的共同意見」，曾對我們有一個概括的解答，就是：「我們只有一個信仰，一個政府，一個領袖。」可是在行動上、政治上、和指揮上發揮這三個中心力量，仍須再進一步，要有一種組織來推進。這個組織是什麼？最近黃旭初先生又對我們釋示得很明白。他會很肯定地說：「擁護一個黨的主義，服從一個政府，一個領袖的指揮。」又說：「大家既然為救國的三民主義而奮鬥，便應該團結在國民黨之下面努力。」最後且叮嚀似的說：「我們的活動，應該完全在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政府，一個領袖的指導之下。」

再說到黨與抗戰問題，黃旭初先生亦曾有正確的論斷。他說：「我們從增加

抗戰力量一點來看，究竟一黨比多黨的國家力量大呢？還是多黨比一黨的國家力量大呢？我以為是一黨比多黨的國家力量來得大。因為現代全民族戰爭的勝敗關鍵，全在於國民團結一致精神如何。多黨的存在所表現的國民團結一致精神，無論如何，不及一黨的良好。況且現在參加抗戰的各黨派，都已表示過信仰三民主義，並願為三民主義奮鬥，這在政見上大衆既已表示相同，何必還要在組織上表示紛歧的現象。」（見血路周刊第六期黨派問題平議。）

黃先生的意見，至少可以說是代表大多數國民的意見，也是抗敵建國過程中應走的光明大路。我們再從理論和事實來加以研究。

建國是一種義務，不是一種權利。無論在歷史上，在國情上，在法律上來說，中國國民黨是「先天的國家。」中華民國的名稱是孫中山先生在同盟會時代訂定的，國旗是陸皓東先烈創製經孫先生同意的。把中華民國比作一座房子，中國國民黨不僅是實行建造的工程師，而且是預先打定完善圖樣的建築師。這座房子現在建設完成了沒有呢？沒有。現正在大風雨中架樑撐柱，來加工進行。這是一

個最爲危急艱難的過程，工程師決不能放棄他的責任。從歷史上來看，國民黨在愈危險的時候，其救國建國之志行亦愈奮發，否則便不成爲一個建國的革命黨。工程師要待房子依照圖樣建築完成，經業主點收之後，任務方纔完了。國民黨亦須待建國完成之後，才能達到還政於民的預定目的。

國民黨的過去歷史及現在的事實，可以證明它把國家民族的利益放在黨的上面，它是堅持着「國家民族利益至高無上」的信念。在黨的名稱上，第一便是「中國」一詞，第二便是「國民」一詞。它是爲國家民族作最忠誠服務的政治大集團。除了中國之外，別無所謂祖國。這與以「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爲目的那個口號喊不通之後，再加上一個「世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口號爲手段者，二者絕不相同。實言之，就是國民黨是實行民族主義，與其他所謂民族政策者，根本上是殊科的。中國國民黨是「國之不存，黨將焉傅，」除了奮勇前進之外，後面是無退路的。在這危險的過程中，它只有以「不成功，便成仁」的大無畏的精神，來完成歷史上無可逃這無可卸揆的責任。建築黃河鐵橋的工程師，在完成之

後，尙自動在橋旁築屋看守若干年，竭力防護橋樑的安全。國民黨的特質，便是充滿這種事業責任重於生命的精神。

不偏安，不割據，這是三民主義者歷史上遺留下來的特性。在民國以前，在二次革命失敗以後，國民黨員雖然無寸土可憑，住在亭子間裏而，可是他們的胸襟懷抱，仍然着眼於整個國家的利益，以治國平天下爲己任。中山先生自始至終，未嘗一日或忘四萬萬人民代表之責，這是最好的榜樣。晚年開府廣東，其非常大總統之任務，亦出之光明正大之合法手續，不放棄其建國之義務。國民黨所要建設的中華民國，決不苟且偏安。它要建設一個完整的三民主義共和國交還給全體國民。有些人拿南宋來比擬現代，這是不倫不類的。其次，國民黨的建國圖樣，是不贊同地方分權及聯省自治的。它不僅自己不割據，也決不允許地方有割據的行爲，破壞國家的神聖的統一性。即以抗戰而言，在政治上決不是採取聯邦式的方式，在軍事上決不容有聯軍式的傾向。否則破壞統一便是減少抗戰的力量。它預備還政於民的國家，是一個統一的三民主義共和國。有些人拿南北朝來比擬

現代，那簡直可以說是漢奸理論。

破壞或阻礙三民主義之完成者，在每次革命進展時，便起了「革命軍起，革命黨消」的邪調，以圖遂其陰謀。三民主義者對於他們堅決的答復，是「革命軍起，革命黨成。」中華民國的建設圖樣是三民主義，而實行建築者是中國國民黨。從前中山先生在廣東時，有一次岑春煊對他說：「我對三民主義也很信仰，請你把廣東讓給我來實行三民主義何如。」中山先生怫然面斥他說：「三民主義是我發明的，如果認為我尙不能實行，那你還能負得起責任嗎？」這是一則很有深長意義的故事。希望一切表面上揚言信仰三民主義，而實則曲解附會三民主義或侮辱破壞中國國民黨者，能以國家民族利益為前提，從這個故事來作深刻反省與體認的工夫。

三民主義是建國的最高原則，在理論上如此，事實上如此，人心上如此，即在法令上亦復如此。國民參政，必須先行取得公民的資格。在公民宣誓詞中，內政法令上便是依照總理遺教，對於「信仰三民主義」有明文的规定。信仰是普通

公民人人皆然，至言實行之中心職責，則繫於中國國民黨黨員身上。所以「願爲徹底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者」，應該加入中國國民黨，才能證實他們的至誠，實踐他們的任務。就以婚姻來譬喻吧，戀愛的最後目的自然是結婚，夫婦便是夫婦，朋友便是朋友，二者截然不同。什麼口頭上儘管高唱「我的精神是永屬於你的」，而事實上既不結婚，又不訂婚，專以虛詞來敷衍搪塞，那無異是以戀愛爲兒戲而已。其用心所在，誰能置信。所以國民黨對於三民主義，既不容有「成功不必自我」之態度，而認「三民主義爲中國今日之必需，願爲其澈底的實現而奮鬥」者，更不應有「紜兄之臂」或「執柯以伐柯」的居心。

「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團結不固。」這是十年來備受痛苦教訓的癥結所在。倘使一方面既聲言願爲澈底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而在另一方面，又斬釘截鐵地說，一分鐘也不停止對於舶來的不適合國情的某種主義的信仰，這好像七俠五義小說中西雁徐良在發誓時玩的把戲，口頭上儘管說「倘使違誓，絕子絕孫」，而脚尖却暗地裏在畫「不」字。十年前因爲沒有建立好共信，互信

團結的鞏固基礎，所以在後不免對於三民主義，有誤解污蔑的言行。現在對於三民主義，既已重有正確的認識與信仰，這是極可珍貴的坦白態度，而且國人也引為羣深慶幸的事情。十年來的痛苦事實，國家元氣既不容許我們重演，而負擔建國責任者也決不願再有此種事實發生。最有效的解決辦法，誠如黃旭初先所說：「在政見上大家既已表示相同，何必還要在組織上表示紛歧的現象呢？」

三民主義是整個的。過去研究經學的，有所謂章句之學，支離破碎，為識者所不取。就三民主義來說，現在有些人以尋章摘句的方法來曲解附會，那也不過心勞日拙而已。再進一步言，實現三民主義是以國民革命為方法。國民革命的陣線，是集合農工商學兵青年婦女各種分子的。國民黨便是要儘量吸收各界優秀的革命的分子，它是超階級而又代表任何階級之利益的政黨。以三民主義之博大，國民黨之容量，那些國民有另定政綱另組政黨之必要呢？現在有些人高唱所謂「民族戰線」或「統一戰線」的調子，其實要達到民族戰線或統一戰線的目的，只有加入國民革命陣線來共同努力，——也即是除了漢奸以外的全民陣線。再依三

民主黨實現的階段來說，現在對日抗戰，爲國民革命必經之過程，這是三民主義中民族主義的一部分。固然，整個三民主義的實現，其基礎應建立在這一次抗戰勝利之上；但也決不能說，這次抗戰勝利，就是三民主義全部的實現。現在有些人提倡「實行革命的三民主義」這一個口號，這不過是玩名詞的把戲而已。三民主義那一部分不充分表現着革命性，有什麼革命的不革命之分？三民主義既不是張小泉陸稿薦，爲什麼要加「革命」爲記呢？他們的口號應該是「實行整個的三民主義」，不過同時應認識清楚實現的方略及其應有之次序。對日抗戰的勝利，是實現三民主義的一部份，其全部實現，尙有待於長時間之努力。所以願爲澈底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者，其任務決不是到抗戰勝利之時爲止。爲求達到澈底實現之目的起見，其最適當的可以盡最大貢獻的奮鬥方式，應該是成爲一個純粹的三民主義常備戰鬥員。

中國國民黨的「建國而仍還政於民」的偉大精神，是「人生以服務爲目的」的實行，亦即是接受了中國先哲「爲而不有」的特質。羅素曾極力贊揚這種特質

是創造精神的表現。中國國民黨要發揚這種創造精神，便應有「道大能容」的寬大爲懷的磊落胸襟。一個偉大的建築師，他應該竭誠歡迎土木工等，指導他們依照圖樣來共同建築偉大的工程。何況現處狂風暴雨之下，更需要有熱誠的有能力的分子充實工作。

一個國家的獨立自由之獲取，沒有不經過重大犧牲與艱難困苦的時期。現在正是獨立自主的中華民族之坐蔘期間，處在產科醫師地位的中國國民黨，也正需要助產士來幫助施行大手術。在中國國民黨黨史上來說，目前正是一個大開大合的關頭，同時也就是一切願爲澈底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者，表裏言行是否一致之試金石。

總結一句，「一個政黨」實在是抗敵建國的最澈底最有力的方法。

民國十三年後有兩個流行的口號，現在還可以很確切地運用，就是：

國民革命者站起來！

把聰明才智能力貢獻到中國國民黨裏來！（民意週刊）

二、一個領袖一個主義

茹春浦

我們要問，因為什麼，憑着什麼，我們可以對日抗戰？這只要從我們抗戰八個月來的事蹟，便可以看出我們民族力量的偉大。只要不是個漢奸，任何人都可以直覺的說是，「因為我們都有民族意識，都覺悟了，中華民族從此以後，是不能再受任何外力的壓迫欺侮。更絕對的明白了中華民族永遠不會滅亡，而且是此後更要雄飛世界，發揚人類的高度文化」。這是我們對於抗戰理論一點極簡單的觀念。

再要問我們民族意識的覺悟，是從那裏來的？是從外國學來的嗎？是從每一個人自己醒悟出來的嗎？還是自然而然的的一種風氣呢？自然這都不是。我們如果再問下去，任何人都可以直覺的答覆說：「我們是從三民主義中，清楚的認識我們民族精神的偉大，更從最高領袖領導我們實行三民主義中，認清復興民族就是我們的責任，我們一定能夠復興民族」。這是我們能夠把民族意識轉變為直接殺

敵的戰鬥心理的原因。假如我們站在外國人的立場上，來估計我們這次抗戰力量，到底是從那裏發表出來的？那麼在一切已開發的物質，特別是軍備力量，被人估計到沒有對於強國開戰的資格的我國，而竟能越戰越有力量；那就不能不承認是精神勝於物質了，更不能不承認是由於我們的最高領袖，拿三民主義的精神，來作為我們抗戰的唯一力量。這就是說「一個領袖一個黨」不僅是我們抗戰的主觀上的要求，而且是國際的客觀上對於我們的認定。

「一個領袖，一個主義」，是發動抗戰的力量，不是經過八個月抗戰，才產生出的口號。我們是從信仰最高領袖和三民主義，才發生出偉大的抗戰力量；不是從抗戰中才感覺到有信仰最高領袖與三民主義的必要，這是人人所了解的道理。就是敵人與漢奸也都知道這個精神力量的偉大，本不需再當作一個題目來說明。現在我們還提出這個題目，是要補充以下幾點的意義：

(一) 要說明這種精神作用，絕對不是對於戰爭和政治的一種手段，而是出於絕對的真誠。我們喊出信仰最高領袖和三民主義的口號時，就立刻覺着自己

和羣衆的精神合流，從領袖與主義的偉大中，直覺到自己的偉大。在戰地就不怕任何危險，就自然可以避免任何危險，一定具有有勝無敗的自信心。同時我們更要知道兩個信仰不能並立，喊出信仰最高領袖和三民主義的口號，立時就要把其他不純正的信念消滅下去。因此我們認爲真的信仰最高領袖和三民主義，是不能站在「民族統一戰線」這個名詞的立場上，而是要站在代表全民的一個黨的立場上。因爲「統一戰線」這個名詞，是表現不出有絕對信仰的中心，是含有一時利害關係的合作的意味，要是把統一戰線解釋有「聯盟」「互助」的幾個平等，獨立，與集合的意味；那根本就失去了一個領袖一個主義的意義。

(二) 更要進一步的認識，我們抗戰，是向世界求得民族的解放。而我們民族意識的發展，是根據於三民主義，是由於有領導我們實行三民主義的最高領袖。我們在抗戰中所以能提高國際地位，得到全世界反侵略國家的同情，是由於國際間客觀的認清我們信仰領袖與主義的抗戰力量。(外國人民許多對我最高領袖表示敬意，沒有一國誤信敵人宣傳說我國「赤化」，都相信我們最高領袖能

爲實現三民主義抗戰到底，一定獲得勝利！）關於此點，我們要知道「一個領袖·一個主義」，不僅是爲我們自身的抗戰力量所要求，而且是爲國際間反侵略國家對於我們的共同要求。因爲我們在國際間有這樣獨立自主的立場，所以我們不必加入國際間的什麼戰線？什麼軸心？而仍然可以運用國際的形勢，增加抗戰的力量。如果我們沒有這樣堅定的信仰，就要任人播弄，早就成爲西班牙第二了。

抗戰以來，爲了更堅固「一個領袖，一個主義」的力量，我們已經付了四五十萬同胞死傷的代價。我們敢斷言，凡是對於這個信念不堅定的人，他都沒有抗戰的勇氣，除了淪奸，是沒有一個敢破壞這樣信念。（時事月報抗戰半月刊）

三、一黨政治與中國

葉青

近代的政治是政黨政治。但這種政治在今天有兩種形式，一種叫做「多黨政治」，即國內有很多的黨存在，互相競爭，那一黨為人民所選擇，便掌握政權；及到它失敗後，別的黨便起而代之；有時某些黨或一切黨聯合起來共同掌握政權。另外一種叫做「一黨政治」，即國內只有一個黨，就是選擇，政權亦始終在它手裏，因為這樣，政權便為它所壟斷，所以一黨政治又叫做「一黨專政」。

中國對於這兩種政黨政治形式應該採取那一種呢？有的人主張多黨政治，有的人主張一黨政治，發生過討論。這種情形，在民族命運已因日本帝國主義底軍事侵略而瀕於千鈞一髮的今天，不僅同樣地有，而且應該訴諸最後的解決，提到實踐日程上來。因此，我們更有把那個問題弄明白的必要。

主張多黨政治的人，他們底理由第一不外乎說歐美各國在從前皆是多黨政治，就是到現在，好些重要國家特別是民主政治國家如英如美如法等，莫不實行多

黨政治，一般國家既然如此，中國又何獨不然？這個理由，很顯然地是說，大多數國家都實行多黨政治，我們怎可不跟着實行？這把中國底情形看成與各國相同去了。其實，中國不是英國，不是法國，不是美國，中國是中國。這就是說，中國有它自己底特殊性。而此特殊性，乃是中國之所以為中國的所在。一切主張，必要適合於此特殊性纔行得通。所以英法美等國及歐美大多數國就皆實行多黨政治，亦不能說中國也應該實行多黨政治。

中國有甚麼特殊性呢？很顯然的，英法美等國及歐美大多數國之造成今日所有的近代的，集權的和繁榮的國家，一般地說，是隨着時間底前進和發展底步驟循序漸進的，帶了濃厚的自然生長性。中國在這裏與它們不同。它是後起之國，要追到它們，必須迎頭趕上去。其不可避免的過程，亦採取迅速方式，它們走了幾百年的，我們要在短時間內走完。因此，國內不可發生政爭和政潮，以白費我們的精力和時間。如果對於政黨政治採用多黨政治底形式，那就必然發生政爭和政潮。並且黨愈多則政爭和政潮也愈多。法國就是一個例子。法國的黨之多，在

歐美各國說來，怕要數第一。然而它底內閣時倒時組，其數之多亦爲歐美各國冠。反之，一黨政治的國家，如俄如意如德，則政府鞏固，幾無政爭和政潮可言。中國要避免政爭和政潮，把我們的精力和時間全用於趕上歐美各國方面，那就非採取一黨政治不可。在歐美那些採取多黨政治的國家，它們的一切都上軌道，并且走到登峯造極的境地，發生政爭和政潮，於它們沒有什麼損失。但在中國而發生政爭和政潮，如果像法國一樣，就很不經濟了。那可以使它在短時期內趕上它們。這是應該注意的一點。

其次，中國比歐美各國特殊的是它們在由封建到近代階段時沒有受外國的侵略，民族獨立；中國在這個時候受外國的侵略，變成了被壓迫民族。因此，我們的工作不只是趕上歐美各國，還要抵抗侵略，爭取民族獨立。而抵抗侵略是一個力量的問題，沒有力量，用什麼去抵抗？力量之造成，除用趕上歐美各國的方法外，就須把現有的力量集中起來，不使分散。而且用趕上歐美各國的方法造成的力量，亦須集中纔有作用。所以集中力量是抵抗侵略的一個原則。否則不僅力量

分散，作用不大，而且力量分散之結果，將造成種種衝突，互相消耗，無法抵抗侵略了。多黨政治產生政爭和政潮，必然走到這種境地。所以多黨政治不適宜於中國。如果說各黨聯合可以救濟多黨分立的缺點，不妨多黨存在，那就必須知道聯合這種集中力量的方式遠不及併合各黨而成一大黨之為好。在歐洲各國，社會進步，民族獨立，內部種種特殊要求可以發展，不妨平時多黨分立，戰時多黨聯合。中國不然。它的現在，內以推動歷史走上近代階段為務，外以抵抗侵略完成民族解放為務，實無發生任何特殊要求之可能，根本不需要多黨分立。這當然不如索性採取一黨政治了。如果此時要先多黨分立後纔來多黨聯合，豈不等於已經知道天腳之必要，還要來一個先纏腳後又纔放腳那樣的一番麻煩嗎？這是枉費人力的事，根本不應該有。

從此種種，可知多黨政治不合於中國的特殊情形。合於中國的特殊情形的是
一黨政治。因此，多黨政治就行於歐美各國亦不能證明其可行於中國。它們的經驗終歸是它們的經驗。這便是我們反對多黨政治主張一黨政治的理由。

如果你不以爲然，那就請把中國實行多黨政治的經驗回顧一下吧。在滿清末年，有很多黨如興中會、同盟會、保國會、政聞社、憲友會、憲政實進會、辛亥俱樂部等；在民國初年，除同盟會及後來又與別些小黨聯合成一國民黨外，有很多的黨，其合併結果則有與國民黨并立的共和黨、統一黨、民主黨等；以後國民黨分裂爲五黨，共和黨、統一黨、民主黨合組爲進步黨，此外又出現有大中黨、公民黨、民憲黨，不久國民黨解散另組中華革命黨。如果由此敘述到現在，要很多篇幅，恕不一一。總之，由滿清末年第一個黨興中會起到現在的抗戰時代而止，中國所有的黨多到不可勝數。然而在國民革命時代以前的，除開國民黨外，全都消滅了。其在國民革命時代和統一戰爭時代出現的黨，爲數雖然不少，但到今天，全都沒有成功。並且有的解散，有的投降，其餘亦皆跟着國民黨走，有併入國民黨的可能。即使未併入，亦無獨立的主張和力量，因此它們也是有等於無了。而且抗戰一延長，其併入或消滅都屬必然。這不是中國不宜於多黨政治的證明嗎？這又不是中國宜於一黨政治的證明嗎？

同時，這四十幾年的歷史還包含有如次的幾個可注意的事實。第一，自有黨以來，只有孫中山先生領導的黨，即首先名與中會，其次名同盟會，再次名國民黨，又次名中華革命黨，最後仍名國民黨的那一個黨纔有四十幾年的壽命，此外黨的旋生旋滅，其存在較久的不過十幾年。第二，在這十幾年中受政府壓迫和敵黨攻擊很多的，當以國民黨爲最，它在這種情形下亦經過了不少的分裂，合併，改組，然而至今不獨依然存在，並且掌握政權。第三，在近十幾年中雖然有與國民黨同樣受過很多壓迫和攻擊，亦同樣經過內部紛爭還能存在的黨，然而其存在的基礎在於國外來的物質（金錢）援助和精神援助，與國民黨之憑藉自己的力量來謀生存發展者迥然不同。第四，在這四十幾年中，成功了的只有國民黨，它不僅掌握政權有十幾年，現任的政權日益鞏固；而且做了很多事業，如辛亥革命、護法戰爭、國民革命、統一戰爭、抗日戰爭至於把它的黨史變成了近幾十年的國史。這四個事實，是中國實行多黨政治所得的結果，因而是四十幾年來的寶貴經驗。它告訴我們，中國之所宜的不止是一黨政治，而且這一黨就是國民黨，換句

話說，中國所宜的是國民黨的一黨政治，即國民黨的一黨專政。

凡此種種，都是中國試驗政黨政治的結果，并非一人之私言或主觀的幻想。根據這種試驗，根據幾十年的試驗，我們可以得結論：中國確自有其特殊性存在，宜於英法美等國的多黨政治不宜於中國，因此我們不能根據英美等國的事實在中國來主張多黨政治。

但是那些主張多黨政治反對一黨政治的人，却不注意中國的特殊情形和歷史經驗。他們的根據是民主主義。這就無異於說，要多黨分立，纔有民主，如果採取一黨政治，那就是一黨專政。其結果，必然造成一種專制局面，壓迫人民，所以一黨專政與民主不相容，它是反民主的政黨政治。

從方法上說來，這種意見根本不能成立。因為它之主張多黨政治，所根據的乃是一種原則，即所謂民主主義者。換成別的話，它是爲了民主主義而主張多黨政治。這很顯然地犯了觀念論的錯誤，一點也不合於科學。依照科學，主張須根據客觀的事實，不可以主觀所願欲的爲憑。所謂客觀的事實，在主張多黨政治上

就是中國的特殊情形和歷史經驗。要中國的特殊情形和歷史經驗合於多黨政治，主張多黨政治纔有堅固的基礎。並且，多黨政治也纔行得通。然而主張多黨政治的人不肯這樣，那麼他所用的方法便錯誤了，其主張就必不正確。這是我們首先要批評的一點。

從理論上看來，這種主張的本身也不能成立。因為所謂民主，不外乎選舉和自由二者。多黨分立，固可實現選舉和自由；一黨獨存，亦可實現選舉和自由。前者的事實，有英、法、美等國存在；後者的事實，蘇聯便是一個例子。據中國今天大叫民主的有些人看來，蘇聯所行的新憲法，是世界上最民主的憲法，它們對於它竭盡了頌揚的能事。然而在蘇聯新憲法下的政治，依然是一黨政治者。從新憲法起草，通過並施行以來，與了幾次巨大的黨獄，在政治上的托洛茨基派，季諾維埃夫派，布哈林派均不允許存在。依我看來，蘇聯所實行的不僅是黨外無黨，而且是黨內無派。這在中國今日大叫民主的有些人看來，並不妨害蘇聯之爲最民主的國家。那末爲甚麼中國的民主就非多黨分立不可呢？很顯然的，一黨專

政與民主相容，多黨政治與民主沒有必然的關係存在。

凡此，不是根據民主原則來主張多黨政治也不能成立的表明嗎？民主主義並不會幫助多黨政治絲毫。同時，它也無益於一黨政治。因此，中國究竟應該實行多黨政治或一黨政治的問題，要從它的特殊情形和歷史經驗合於多黨政治，那就應該主張多黨政治。反之，它的特殊情形和歷史經驗合於一黨政治，那就應該主張一黨政治。解決問題的關鍵在於這裏。

這樣，問題便解決了。如前所說，中國的特殊情形和歷史經驗都表明多黨政治不適宜於中國，要一黨政治纔適宜於中國。這樣是很科學的道理，無人能反對。

進一步說，這種特殊情形和歷史經驗又都表明此一黨政治就是國民黨掌握政權。歷史經驗的表明非常顯然。多黨競爭歷史淘汰的結果只有國民黨纔勝利，纔至今掌握政權不倒，而且日益鞏固。特殊情形的表明，就在其中。至於國民黨之為中國由封建到近代階段中的唯一革命黨而在中國淪於被壓迫地位中的唯一民族

黨一點，當然是它適合於特殊情形的存在。這也是很科學的道理，無人能反對。

然而竟有反對的人，他們不僅反對一黨政治，並且反對國民黨的一黨政治。他們把國民黨的一黨政治認為是『它無民主的國民黨一黨專政。』關於這點，我曾說過如此一段話：『現在的政治並不是封建的，所以政權不在貴族手中或君主手中，而是在國民黨的手中。國民黨不是貴族，乃是人民的政治團體，以代表全國人民自任的。它以民權主義和五權憲法為旗幟。而它之取得政權，是用革命手段從封建勢力方面奪過來的。俄國革命後由唯一的黨掌握政權的事，更給以新的教訓。所以國民黨掌握政權是中國民主在革命過程中的特殊形態。它顯然可名為『國民的民主專政。』如果把它認為『它無民主的國民黨一黨專政』，那便錯誤已極！

因此，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並沒有理由。而這些反對的人現是有黨的人。所以他們的真實理由，在於為他們的黨要求存在，要求政權。只有他們在國民黨之外另組有黨，不得不反對一黨政治，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而主張政黨政治。

那末他們的真實理由便是主觀的需要，一黨一派的利益了。這是完全沒有站在客觀事實上着眼的，因而大有背於民族利益。我很希望他們在今天民族命運十分危急，必須集中力量以爭取生存的時候，拋棄其主觀的和黨派的利益，解散自己的黨，一齊加入國民黨。（民心旬刊）

四、黨派問題平議

黃旭初

自抗戰轉入第二期以後，武漢言論界對於黨派問題，議論紛紛。有的主張國民黨一黨存在，實行「黨外無黨黨內無派」；有的主張各黨各派並存，定一共同綱領作為各黨各派共同信守的行動軌範。自經毛澤東先生以代表中共中央資格，在延安發表了一個指斥主張一黨制的非常，并請各黨各派警戒着的砲彈式談話之後，這個問題，似乎格外嚴重了。可是有一點，我們可以斷定，就是無論那一方的主張，它的目的都是在乎增加抗戰力量，並不是想掀起抗戰陣容內部的磨擦，不過增加抗戰力量的辦法，見仁見智，意見尚未盡同，這是應請大家注意的。如果因為討論增加抗戰力量，經過毛澤東先生砲彈式的談話後，接着便形成黨派的紛爭，那真是抗戰前途的不幸。這倒要請大家警戒着的事！

我們從增加抗戰力量一點來看，究竟是一黨比多黨的國家力量大呢？還是多黨比一黨的國家力量大呢？我以為是一黨比多黨的國家力量來得大。因為現代全

民族戰爭的勝敗關鍵，全在於國民團結一致精神如何。多黨的存在所表現的國民團結一致精神，無論如何，不及一黨的良好，況且現在參加抗戰的各黨派，都已表示過信仰三民主義，並願為三民主義而奮鬥，這在政見上大家既已表示相同，何必還要在組織上表示紛歧的現象？毛澤東先生的談話裏說，多黨的存在，便是由於階級社會的存在；所以除了蘇聯現在祇有一個階級一個黨外，其他國家事實上都是存在着多黨，這雖然也有相當理由，可是不大適用於現在的中國。因為一個國家到了危急存亡之秋，祇有民族的利益，沒有階級的利益。中共中央宣言為三民主義而奮鬥，就是表示現在祇有各階級一致的民族利益。既然現時各階級一致為民族的利益而奮鬥，那就不應該仍舊保存着一階級一黨的分散力量的現象，應該各階級團結在一個政黨之下，使抗戰力量得以集中。

退一步講，多黨的存在，雖然它的力量集中，不及一黨統一來得大；可是也並不妨礙國家的統一，這也是一個事實。不過國家的統一，不在消極的形式上的一致，而在於積極的行動上的一致，尤其在一個戰時狀態，必須政府要能統制一

切，然後可以發揮全民的抗戰力量。對於現在的抗戰，固然大家表示一致的精神；可是在抗戰行動上——就是關於抗戰的一切設施——要是大家還是各行其是，那就不是國家統一的現象。如果我們這次抗戰，祇是各黨派利用抗戰局面來各圖增進一黨一派的力量，那就不必再說；要是抗戰是為救整個民族的生存，那就不能不要求大家除了擁護政府抗戰外，更其要絕對擁護政府的抗戰行動。上面這句話，並不是不准大家對政府作善意的批評和良好的建議，也不是不許各黨各派用合法的活動來增進其勢力。可是我們既然擁護一個黨的主義，服從一個政府一個領袖的指揮，便不能為了增進自己一黨一派的勢力，削弱這一個黨，這一個政府，這一個領袖，因為削弱他們，便是削弱抗戰的力量。而因此引起意外的紛爭，更不是民族的前途的幸福。

總結一句話：大家既然為救國的三民主義而奮鬥，便應該團結在國民黨之下來努力。退一步講，我們即使保存着多黨的組織，可是我們的活動，應該完全在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政府一個領袖的指導之下。我們不必各爭雄長，因為現在的民衆，將來的歷史，自會判斷一切的是非和功罪的。（血路週刊）

五、我們對於黨派問題的意見

陶百川

最近武漢的報章雜誌上，就我所看到的來說，有四篇關於「黨派問題」的論文：（一）陳紹禹（王明）先生的「挽救時局的關鍵」。（羣衆第四期）；（二）長江先生的「抗戰中的黨派問題」，（抗戰第三十六期）；（三）葉青先生的「關於政治黨派」，（掃蕩報）；（四）時代日報的「復興國民黨」。這四篇論文，各有不同的立場，各有獨特的見解，而其問題本身又是十分迫切而重要，所以我們預料一定已經引起讀者的注意。我爲這個問題曾去訪問過一位國民黨的老黨員，提出上面四篇論文的要點，徵詢他的意見。現在把我們的問答摘要記下來，以供讀者的參考。不過本文未經那位老同志看過，應由我負其文責。又，那位老同志並未負有實際的政治任務，應請讀者不要看做是中央的代言人，而且不要把他的意見看做是中央的政策。這是我要特別聲明的。

對於那四篇論文，我先提出葉青先生的一篇來徵詢×先生的意見。

「葉青先生大聲疾呼：『尊重國民黨的唯一性！擁護國民黨的領導權！』他主張『以大併小的方法，融化小的單位』，由國民黨來統一各黨各派，而不是與各黨各派相聯合。他以為『聯合這種團結方式，以承認各個單位為原則，所以各個單位聯合了，依然各是各的。這『各是各的』一點，便是離心傾向的根源。……融化（合併）是合而為一，根本沒有離心傾向』。他以種種理由說明祇有國民黨可以獨立存在，此外各黨各派都沒有獨立存在的理由。×先生，你對葉先生這個論旨和辦法，有什麼意見？」

「我贊成他的論旨，但我不能贊成他的辦法。」×先生很爽直的回答。「國民黨有理由可以獨立存在，這是沒有疑問的；但是各黨各派的獨立存在，（姑無論其實力如何），這也是一個事實，我看現在還沒有妥善辦法可以把他們合併起來，融化起來。因為若照民國十三年辦法，則共產黨在國民黨內成立黨團，在國民黨外秘密保存組織，不獨不能收融化統一之效，反使國民黨同室操戈。這顯然是很要不得的。反之，若照民國十六年的辦法，表面上各黨各派雖不能公開活

動，然中國青年黨和共產黨等一直秘密存在，直到如今；足見僅恃取締也是沒有效果的。所以我不贊成葉先生的辦法。」

「現在很有許多一黨專政的國家。且如蘇聯一向施行民主政治，一面不准他黨存在，而後者並不妨礙前者的進行，我們何嘗不可效法蘇聯，不准他黨存在或活動？」另一位同志這樣和×先生討論。

「這話也有理由，但是中國有中國的歷史和環境。現在強鄰壓境，我們何忍箕首相煎！所以除非像陳真如先生等那個組織那樣自動的宣告解散，我看中央不會再向各黨各派提出這個要求。至於陳真如先生等那種態度，我們自然是很欽佩，而其辦法，我們也認為是很賢明的。」×先生的解答。

「×先生，你是主張各黨各派的獨立存在的了，然則你的見解或與長江先生的見解大致相同。不過他主張「由政治與法律觀點確定黨派關係：究竟國民黨以外各黨派今後對於國民黨在政治上法律上佔如何地位？」先生以為有此必要麼」

？我問：

「我以爲無此必要。」x先生說。「誠如長江先生所說，『抗戰以後，共產黨統一戰線宣言由中央社發表，蔣委員長又公開對國共合作發表談話，此在消極的意義言之，國民黨在政治上與法律上承認共產黨之存在爲合法』。長江先生還要國民黨如何承認呢？既然『國民黨在政治上與法律上已承認共產黨之存在爲合法』了，我以爲這樣已經很夠了。至於『各黨派今後對於國民黨在政治上與法律上佔如何地位』，則我以爲當然不是國民黨居領導地位，大家在三民主義這個共同綱領之下，彼此相安，向前邁進。將來隨着形勢的推移，政治慢慢走民主政治的道路，軍事漸成爲統一的國防軍。我想這不致遭賢明的各黨各派的反對吧。」

我說：「我也有這樣感想。陳紹禹先生在『挽救時局的關鍵』內就沒有要把國民黨把共產黨的地位再用法律來承認一下。就我所知，其他黨派也沒有這個要求。但是陸先生確曾要求：『第一，須協商和通過一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共同綱領；第二，須成立一個由國共兩黨組織的經常協商和計劃各種問題的組織；第三，在軍事問題，政府問題和民運問題各方面，國共兩黨應有更加鞏固和擴大合

作的範圍和程度」，你對這三點有何意見，×先生？」

「關於第一點，三民主義是我們的綱領，也應當是共產黨和其他各黨各派的綱領，我們不能，也不必另來一個綱領。關於第二點，各黨各派乃至國民黨自己，俱應聽國家最高統帥，——蔣委員長의 指導和命令，不得擅作主張。而且國防參議會即將擴大組織，誠如長江先生所說，各黨各派都有人參加，彼此儘有協商計劃的機會，此外不必另有類似的的組織。關於第三點，我以為倒相當需要。雙方對於各項問題，恐怕都有不滿意於對方的地方，我們希望雙方負責人能作一番嚴正的檢討和適當的解決。」×先生很嚴肅的說。

「時代報論「復興國民黨」的社論，×先生有看到麼？」我問。

「沒有看到。」他答。

我於是約略提出那篇社論的要點，而尤三注意於其七個辦法。

他說：「第六個辦法，——要嚴密黨的組織，嚴明黨的紀律」，我以為很有必要。今日之事，不在能破而在能立。國民黨不必怕懼各黨各派，但是必須自我

批評，澈底覺悟，切實負責；而嚴密組織，擴大組織，（我以為國民黨現在應該擴大吸收新黨員），嚴明紀律，實為以上三者的具體表現。」

談到這裏，時鐘已報六點，我們約定三四日後再談一次，屆時如有所得，當再在此發表。（血路週刊）

六、統一抗戰與階級問題

羅敦偉

前言

因為共產黨公開的活躍，一般青年又回復到對於階級理論的注意，共產黨也多討論到這個問題。個人對於共產黨並沒有主觀的好惡。不過以為階級問題，倒值得我們的檢討。現在一般人士，對於階級問題顯然的出了幾個不同的觀點。第一種人們，以為在今日「一切統一於抗戰」階段的中間，不僅不應該主張階級鬥爭，即階級鬥爭的理論，這個時候，最好不談，以免分散我們注意力的集中。第二種人們，以為現階段應該強化抗戰，當然不必談階級鬥爭。可是階級鬥爭，是歷史車輪推進的軌跡，現在不過是暫時矛盾的統一，所以此刻雖然不必主張，可是不能不把階級鬥爭的意識，趁這些紀念日，滲透到每一個人的心坎上面，作為展開將來鬥爭的潛在力量。第三種人們，以為中國本質上不是階級對立的國家，未來中國的路線，既明明白白決定實行「計劃經濟」，永久不會造成社會上的階

級對立，也永遠不會再現階級鬥爭。此刻正應該給民衆的一個正確認識，把一切的一切，集中民族鬥爭，不要再談階級鬥爭。到底那一種是正確的，值得我們一個新的估計。

估計上述各種理解的價值，不可以憑着個人的主觀，也不可拘執集團或政治的成見，應該根據科學的立場，而且應用新興社會科學的立場，才能得到一個正確的評價。

一、中國社會本質的特殊

討論階級問題之先，我們對於中國社會本質，應該有一個明白的認識。馬克思按照唯物史觀，以社會本質分爲四個形態。即：一，古代的共產社會，二，奴隸社會，三，封建社會，四，資本社會，而決定各個社會的基本條件，即是各時代不同的「生產關係」。『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就成立社會的經濟結構，真實的基礎。』（馬克斯經濟學批判序言）蒲列哈諾夫在所著的馬克斯主義基本問題中間，根據這個又決定有名的五個公式。把社會的主要決定力量置於生產關係之

上，所以我們如果要知道中國是什麼社會，以及他和階級鬥爭的關係如何，必須根據這個學理。學理上的真理，只有一個，如果中國需要階級鬥爭，則不能放棄，否則，即自本質上應該有一個明確的認識。

在過去我國論壇上作分析中國社會本質工作的人們非常之多，主要的有共產黨的幹部派和反幹部派。幹部派以爲中國是封建社會，「農村階級的分化，係由於有嚴酷的剝削關係」。反幹部派則以爲中國社會已經達到資本主義的程度，「中國社會經濟結構雖是複雜，但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居於領導（即支配）的地位」。（嚴靈峯，追擊與反攻）因此彼此鬥爭，互不相下。他們主要的錯誤，即是僅僅機械地了解馬克斯的理論，以爲一定要照馬克斯所舉出來的公式，再把中國社會套進去，而根本上並不了解中國社會。換句話說，只知道死死地去運用馬克斯的研究，而不知道辯證法地去利用馬克斯的學說。充其量，也不過是機械的唯物論者。

我們如果詳細地觀察中國社會，即知道中國社會是不能用馬克斯的上述四種

社會型態範圍的。即所謂『亞細亞的生產方式』，也不能說明中國社會的本質，因為現代的生產關係已經突破了國界，中國的生產關係是世界經濟之一環，而中國的生產能力，却仍然以國家為範疇，而停留在落後的階段。所以我在拙著『我們的社會』中間說過：很明白的，現階段中國的機械與勞動一大半還停留在封建經濟的領域，而生產關係，最重要的剝削關係，却已經突破了這個範疇而與世界經濟一致。實際點說：帝國主義之對中國農村經濟的壓迫，已經充分的現代化，資本主義化，可是中國現階段的農村經濟，農村的生產力却還停留在封建經濟的範疇。

反幹部派看了前一半，以為是資本社會，幹部派看了後一半，以為是封建社會，都祇看到了一半。其實中國的社會本質，完全是『次殖民地的』，一方面是帝國主義與民族經濟的對立，一方面是殘餘的封建勢力與一般勞苦大眾的對立。民族對立比較階級對立，深刻得多，嚴格地說，並沒有明顯的階級對立。這是我們對於中國社會的『自我批判』，也就是對中國社會的基本認識。

一一、階級問題的正確認識

一般倡階級理論的人們，每每只憑主觀，而沒有客觀的認識，甚至也不了解馬克斯。「階級」是什麼？馬克斯正準備下定義，即資本論正寫到此地，不幸作古，所以在社會主義古老的文獻中間，不容易找到階級的正確解釋。通常人以貧富去劃分階級，當然是不科學的，而以「等級」的區別，誤為階級，也同樣不對。在過去共產黨的作家中間，過階級的定義，布哈林在當日被認為共產黨中心理論家時代他說過：「所謂社會的階級，即是指出一種「人的總和」而言。他們在生產中的作用相同，同時這種關係也即表現在「物」的方面。（勞動工具）」。佛爾遜說：「某一種社會集團在生產過程中所佔的地位，及在國民經濟系統內所起的作用。——就是馬克斯主義分析階級的時候所根據的準繩。某一社會集團的人，如果他們在生產過程中佔據同樣地位，因此與其他集團中人成為對抗的關係，則他們就同屬於一個階級」。〔見辯証法的唯物論〕他並且說這是他自馬克思昂格斯浩瀚的著作中間所歸納出來的。列寧在「偉大的創意」中間，這樣地解

釋過階級，「階級是一種多數人的集團。此集團中各分子，其在歷史決定的社會生產系統中所佔地位，其對生產機關的關係，其在社會勞動組織上的作用，都與集團外的人不同。」我在寫拙著「現代國家學」的時候，曾對此有詳細的檢討。以為階級的定義是：

階級是由生產過程中的作用所決定的各自獨立於同一的生產關係之人的集團。各階級間的差異，即生產關係的差異。其他一切差異，都不能構成階級差異的原因。

由上面的檢討，我們可以知道，階級並不是隨便可以瞎說的，它有一定的定義。

「階級鬥爭」是社會的一種病理。共產黨宣言上面雖然說過「一切社會鬥爭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可是馬克斯在資本論中間說過：「英國的正統派的經濟學，是屬於階級鬥爭尚未發達的時代」。其實他不僅說階級鬥爭有不存在的時候，而且他認為有階級還算不了一個階級，他在「拿破崙第三的二月十八

日」中間即說過：「拿破崙第三代表一個階級，——小農，但嚴格的說來，他們還不能算一個階級……還沒有組成一個一致而有自覺的階級」，而在工業社會的初期，即是資本主義初期時代。「經濟關係起初變民衆爲工人，資本的統治，替這種羣衆造成同樣地位和共同利益，由此可見，就對資本關係而言，羣衆已經是一個階級，但對自己說來，還不是一個階級。」連階級都說不上，當然更談不到階級鬥爭。

所以一般盲目提倡階級學說，或者階級鬥爭的人們，不僅忽略了客觀的事實，也背叛了馬克斯的學理。

二、中國永遠不要階級鬥爭

由上列中國社會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來，中國社會完全是次殖民地的社會。在這個生產關係中間，主要的是帝國主義經濟與民族經濟的對立。而由我們對於階級定義上研究，在同一生產關係之下的人們，決不是兩個階級。我們整個民族既在帝國主義壓迫之下，那末，全民族即是同在一種次殖民地的生產關係的中

間，那裏來的明白的階級對立。更談不到階級鬥爭。——這是鐵的法則，也是鐵的事實。

現在，是整個民族生命的生死關頭。日本帝國主義對我們的壓迫，也達到了最高點。正需要發動民族鬥爭的高潮，一切的一切統一在這個民族鬥爭之下。因為我們如果不能在這次爭取民族的獨立，保持我們領土及行政的完整。立刻，即把整個民族生命，陷於萬劫不復之境。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常識，依存於這個常識的指示，我們必須掃蕩一切違犯這個民族鬥爭的理論，和削弱這個鬥爭的思想 and 行動，而階級理論和階級鬥爭的思想，即是我們應該掃蕩的第一個對象。

如果說到中國的未來，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已明白的規定，今後建國目標，當實施「計劃經濟」，三民主義的計劃經濟，目的在充實人民的衣食住行，即永遠不會造成階級對立的社會，也永遠的不需要階級鬥爭。因此我們希望標榜階級鬥爭的共產黨，不僅手段的放棄階級鬥爭，暫時的放棄階級鬥爭，更不要誤會以為是「暫時的矛盾的統一」，應該進一步真正的看清中國社會本質，真正的懂得馬

克斯理論，自根本上否定階級鬥爭，否定一切階級政治運動，在民族鬥爭期中，以及今後三民主義建國期中乃至將來三民主義社會中間徹頭徹尾的存在性。那末，才可以真正展開舉國一致的民族鬥爭，也才夠得上真正信仰三民主義！（民心旬刊）

七、張國燾脫黨問題之我觀

徐詠平

(一)

四月二十日漢口新華日報廣告欄中，登載着一則「中共中央關於開除張國燾黨籍的決定」的啓事。這啓事一直登載了好幾天，因為是本文中重要的文獻，故錄原文如下：

「張國燾已於四月十七日在武漢自行脫離中國共產黨。查張國燾歷年來在黨內曾犯錯誤極多，造成許多罪惡，其最著爲一九三五年進行公開的反黨的反中央鬥爭，並自成立僞中央以破壞黨的統一，破壞革命紀律，給中國革命以很多損失。在中央發佈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總路線後，他始終表示不滿與懷疑。西安事變時，他主張採取內戰方針，懷疑中央的和平方針。此次不經中央許可，私自離開工作，跑到武漢，對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表示不信任，對中國革命的光明前途表示絕望，並進行破壞全國抗日團結的各種活動，雖經中央採取各種方法，促其覺

悟，回黨工作，但他仍然毫無改悔，最後竟以書面申明自行脫離黨。張國燾這種行動，當然不是偶然的。這是張國燾歷來機會主義錯誤的最後發展必然結果。中共中央爲鞏固黨內鐵的紀律起見，特決定開除其黨籍，並予以公布。四月十八日。

下：這啓事登載以後，四月二十日，張國燾在掃蕩報登聲明啓事一則，茲錄如下：

「閱讀中共中央關於開除張國燾黨籍之決定一節，本人特爲如下簡單之聲明：（一）本人素具抗戰到底之堅強決心，和抗戰必勝之堅強信心。對於中國抗戰建國之光明前途，並無絲毫失望。本人更願貢獻一切，爲國家民族效力。（二）當此國家民族危急存亡關頭，本人認定國家民族高於一切。（三）三民主義爲中國今日之必需，中國國民黨爲主持抗戰建國大計之領導中心，蔣先生爲全國唯一之最高領袖，此三點中共中央亦不否認。中共中央主張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方針，自是中共中央的進步，本人亦表贊成。但深感如此還是不夠，因主張中共中央

對於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和抗戰建國綱領，應即爲更懇切之響應，以達更進一步之精誠團結，和增強抗戰建國之力量。（四）本人曾本以上主張，用至誠態度，與陳紹禹周恩來秦邦憲三同志初步商討，不料此項商討僅在開始進行，中共中央突有開除本人黨籍之決定，公佈報端。本人與中共關係極深，該決定內所說各點，均不必急於答辯，甚望中共中央和中共諸同志對於本人上列主張，深切考慮，並與本人誠懇商討，不使稍有遺憾，俾吾人與全國人士，均得共本抗戰救國抗戰建國之主旨，向前邁進，則幸甚矣。」

對讀了這二則通告與聲明之後，我們深深感到這決不是張國燾個人的脫黨問題。試把張國燾的聲明，詳細觀察一下，便可知道。

（三）

張國燾在共產黨裏是個有地位的黨員，黨齡極長，加入共黨的最早份子，與瞿秋白等齊名，地位不在毛澤東之下，且爲中共中央的第一屆中委，曾兩度派赴留俄，最近在脫黨前擔任邊區政府的主席。這樣看來，張國燾與中共中央的關係

，正如他自己在聲明中「本與中共關係極深。」驟然看了雙方面的文字，如誤認爲共黨內部黨員的黨籍問題，便大錯了，這問題事實上並不這樣簡單的。因爲第一點，張國燾在黨內的歷史之久，地位之高，決不會這樣輕易而草率開除的，反過來說，張國燾必有其堅決的信心，才會離開關係極深之共產黨，決非偶然之事，也可以想見的了。其次，共產過去開除黨員，對外向不公告，——不管其爲向外人說明原委或是在求各方同情！——即使共黨的老頭子陳獨秀之被開除，亦只向黨員公告其開除黨籍決定書，沒有像這次般如此昭張的。可見此次事態之嚴重。

就張國燾的聲明書看來，他的主張：

- 一、抗戰時期，國家民族高於一切；
- 二、抗戰必勝，建國必成；
- 三、三民主義爲中國今日之必需，中國國民黨爲主持抗戰建國大計之領導中心，蔣中正先生爲全國最高領袖；
- 四、統一戰線還不夠強調，中共中央對中國國民黨臨大會宣言及抗戰建國

綱領，應即有更懇切之響應，以達更進一步的精誠團結，以增加抗戰力量。

而中共中央「九二二」公布的國共合作宣言，及其前後所發佈的文字，對前三項自然沒有反對，其所爭持的是第四項。中共中央仍是主張統一戰線，而張國燾則不主張統一戰線，而主張更進一步的團結。

所謂不主張統一戰線，就是反對統一戰線。統一戰線是共產黨叫出的口號。什麼叫統一戰線呢？「七二三」的中國共產黨為日本帝國主義進攻華北第二次宣言中有極詳盡的解釋，是「以國共兩黨的合作為基礎，團結一切抗日救國的黨派，創立鞏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把這句說分析起來，則可歸納到三點：

- (1) 國共兩黨互相合作，此種合作為抗日救國之基礎；
- (2) 一切黨派凡是救國抗日的，團結在一起；
- (3) 這樣成爲一條抗日救國的民族統一戰線。

這簡單明瞭的說，就是把中國的政治，變爲多黨政治。張國燾則不如此主張

，即反對這樣的統一戰線的政治，——多黨政治，——他主張更進一步的團結。他說三民主義爲中國今日之必需，那就是非三民主義之主義是中國今日之所非必需的，凡物既非必需，便該在取消之列，或者暫擱一旁，那末共產主義無疑是非必需的主義之一。凡一政黨必有其政綱，產生政綱的是政黨所崇奉的主義。今共產主義既不是今日中國之所必需，那末共產黨自然在取消之列。共產黨既然客觀上失其存在的條件，則以國共兩黨合作爲基礎的民族統一戰線，當然不能成立。所以明白的說，張國燾認爲共產主義非中國今日之所必需，共產黨不能單獨存在，民族統一戰線是不可能的；我們只有民族至上，需要更進一步的精誠團結，在「中國國民黨爲主持抗戰建國大計之領導中心」之下，共產黨仍要回復到這個中心裏來，每個共產黨員，都成爲國民黨主義所陶冶成熟的忠實同志。把共產黨融化在國民黨裏去。

(三)

以在共產黨裏有歷史有地位的張國燾說出這樣的話，其爲中共中央所含恨者

可知，故受了開除黨籍的處分。

張國燾之所以會發生這樣的思想，在主觀上說，自然是由於他思想上的轉變；在客觀上說，必定由於實際環境，使其思想轉變，信仰改正，終至毅然脫黨。

中共中央的通告中，說：「查張國燾歷年來在黨內會犯錯誤極多，造成許多罪惡」。據我們所知道，南昌暴動之際，張國燾奉派為指導員之一之後，與毛澤東同受處分，因為犯有機會主義的嫌疑，並派赴俄京，越年歸國，任全國蘇維埃人民委員會副委員長，瑞金擊破，長征到川，有南下北上之爭，張國燾主南下，毛澤東主北上，結果是實力派的毛澤東勝利。故曰「其最著為一九三五年進行公開反黨反中央鬥爭，並自成立偽中央以破壞黨的統一」，因為同情南下的人都以張國燾為中心，一致主張與中央政府聯絡，聽命中央，但北上派主張打通國聯路綫，與蘇俄聯合。結果張國燾的主張被推翻了。

但是客觀的環境，——中國的經濟現狀及政治特質與人民生活狀況——使張國燾先則懷疑共產主義的實現之可能性，抗日戰起後，終使他認清了中國目下

的實際需要，放棄他信仰了久遠的共產主義，脫離了關係極深的共黨。

爲什麼呢？

就中國的社會情形來說，中國在政治上，需要一個權力集中的政府，來統一全國，消滅封建殘餘勢力，外而打倒帝國主義的壓迫，求中華民族永久自由獨立解放！故我們所需要的是全民的民族革命，不是階級鬥爭；是全民的民主政治，不是無產專政。中國在經濟上則需要「節制資本」與「平均地權」，因爲中國目前的經濟問題，是生產問題，不是分配問題。只是生產不足，不是分配不當。關鍵在如何增加生產而已。

這是很顯明的事實，張國燾的學識與經驗，使他澈底覺悟。我們相信共產黨裏像張國燾般的認識與見解的人，一定不少，這是時代的趨勢如此之故。

抗戰需要勝利，勝利必先自統一；現在統一的基礎已經穩固，只剩下了政治上的黨派問題。張國燾的脫黨是這問題即將解決的先聲吧。（民心旬刊）

八、國家社會黨與中國青年黨公開以後 周洪山

國家社會黨和中國青年黨都公開了，國民黨也承認他們存在的地位，這不能不說是中國政治上的一個大開展。

自八一三戰事發生以來，共產黨及所謂文化人紛紛提倡民主政治，其實民主政治本來不是什麼新奇的东西，只是三民主義中的一環，此次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發表宣言並確定抗戰建國綱領，民主政治便得到更進一步的實現。查抗戰建國綱領第二十六條載：「在抗戰期中，於不違反三民主義最高原則及法令範圍內，對於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當予以合法，充分保障。」接着國家社會黨代表張君勳致函國民黨汪兩總裁聲明「該黨主張與三民主義精神上原無二致，今後願本精誠團結共赴國難之意旨，與事實上領導政局之國民黨，遇事商承，以期抗戰期中言行之一致。」汪汪兩總裁當覆函有所策勉。（見四月二十一日武漢各報）不久，中國青年黨代表左舜生亦致函汪汪兩總裁聲明「該黨主張之國家主義民

主政治與三民主義不相違背，並竭誠歡迎國民黨之臨全大會宣言及抗戰建國綱領。今後願與國民黨共患難，爲抗戰建國盡最善之努力。」蔣汪兩總裁亦覆函勸勉。（見四月廿七日武漢各報）這樣一來，國社黨和青年黨已經取得公開活動的合法地位，國民黨亦增進了領導的權力，而最重要的收穫是三民主義已成爲舉國一致信奉的革命原則，今後國內思想上言論上獲得一個不偏不倚的準繩。

回憶自立憲運動發生以來，國內政治思想之虛雜，真是無法形容。甲有甲的主義，乙有乙的政見，固然大多數人傾向於「民主共和」，但也有少數人憧憬着「太平天子」。就留學生來講，日本留學生主張要學日本的政治制度，法國留學生主張要學法國的政治制度，英國留學生要主張學英國的政治制度，美國留學生主張要學美國的政治制度。就政治制度的試驗來講，時而內閣集權制，時而總統集權制。有時高唱聯省自治，有時且排演着「天子萬歲」的滑稽劇。就派別來講：以往有保皇黨，有革命黨；後來有共和黨，有民主黨，有國民公黨，有統一共和會；此外又有交通系，研究系，政學系，安福系，直系，奉系，再後來，又有

共產黨，國家主義，社會民主黨，法西斯蒂，托洛斯基派……凡屬世界政治舞台上所有的把戲，差不多都搬到中國來表演過。可是事實上證明，這些「舶來品」，都有點不適合大中華民族的胃口，經過三四十年痛苦的經驗上的教訓，纔知道中國只有孫中山先生手訂的三民主義，才可以行得通。到了去年九月二十三日，素來以階級鬥爭相標榜的共產黨也公開承認：「三民主義爲今日中國所必需。」其他黨派到現在亦才了解到舶來品不合中國人胃口的道理。正如張君勱致蔣汪兩總裁那封信上所說的一樣：「今之持共產說者，漸自階級立場轉而努力於民族生存，持極權說者，亦知法西斯主義難行於中土，此吾民族之不走極端而好調和之明證也。」我以為惟博大精深無所不包之三民主義，有此項調和性，宜乎爲中國共產黨國家社會黨中國青年黨等所共同信奉，所共同擁護。自今以後，大家應該更進一步在三民主義旗幟之下，統一其思想，統一其意志，統一其言論，統一其行動，這於抗戰建國的前途，實在有莫大的裨益。

而且此次國民黨承認國家社會黨及中國青年黨的公開活動的地位，不僅在國

內有很大的收獲，即在國際間亦博得良好的影響。狡猾的敵人素以「防止遠東赤化」爲侵略我國的掩飾，我國有少數號稱國際政治學者的文化人往往于無形中替敵人作義務宣傳。說什麼「日本侵略中國的目的是在進攻蘇俄」，反過來說，如過他不是爲了要進攻蘇俄，他便不會侵略中國。這正是替敵人作欺騙宣傳，在這種欺騙宣傳之下，敵人擷取了東北四省，取得英美人某一方面的諒解，在這種欺騙宣傳之下，敵人訂立了防共協定，而得意德兩國的協助；在這種欺騙宣傳之下，敵人掀起了蘆溝橋事變而博得反共國家的同情。尤其是國民黨容許共產黨參加抗敵以後，敵人在國際宣傳台上總是說中國快要赤化了，中國快要被蘇俄併吞了，日本在國際間負有防止遠東赤化的使命，所以，不能不出兵到中國去做肅清赤匪的工作。世界上的法西斯蒂的國家對於這種宣傳固屬是聽之無疑，就是民主政治的國家亦有一部份人對於這種宣傳絲毫不討厭。這樣一來，我們在國際上算是吃虧不小。現在，敵人的欺騙宣傳給鐵一般的事實粉碎了。國家社會黨可以在中國公開活動，中國青年黨可以在中國公開活動，共產黨只不過是公開活的黨派

之一而已，所以，這次國民黨開放黨禁之後，民主國的英美將認中國是同一政治制度的與國，法西斯蒂的德意也不會懷疑中國會走上共產之路，蘇俄呢？他是向希望中國實行民主政治以利中國共產黨活動的，當然也不會感覺失望。將來，祇要我們運用得法，國際間對於我們的同情與協助是大有增進之可能。我們沒有別的希望，祇希望國民黨領導其他各黨一致努力向光明的前途邁進！（奮勉週刊

革命領導權下編

一、蔣委員長對中國共產黨宣言的談話

「國民革命之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總理曾說明三民主義即希望全國國民一致為挽救危亡而奮鬥，不幸十年以來，一般國人對於三民主義不能真誠一致的信仰，對民族危機亦無深刻之認識，致使革命建國之過程中遭受不少之阻礙，國力固因之消耗，人民亦飽受犧牲，遂令外侮日深，國家益趨危殆。此數年間，中央政府無日不以精誠團結共赴國難相號召，而國人昔日之懷疑三民主義者亦均以民族利益為重，放棄異見，而共趨於一致。足證國民今日皆已深切感覺存則俱存，亡則俱亡之意義，咸認整個民族之利害，終超出於一切個人一切團體利害之上也。此次中國共產黨發表之宣言，即為民族意識勝過一切之例證，宣言中所舉諸項，如放棄暴動政策與赤化運動，取消蘇區與紅軍，皆為集中力量，救亡禦侮之必要條件，且與本黨三中全會之宣言及決議案相合，而其宣稱願為實現三

民主義而奮鬥，更足證明中國今日只能有一個努力之方向。余以爲吾人革命所爭者，不在個人之意氣與私見，而求三民主義之實行，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應計較過去之一切，而當使全國國民澈底更始，力謀團結，以共保國家之生命與生存。今日凡爲中國國民，但能信奉三民主義而努力救國者，政府當不問其過去如何，而咸使有效忠國家之機會，對於國內任何派別，只要誠意救國，願在國民革命抗敵禦侮之旗幟下共同奮鬥者，政府自當開誠接納，咸使集中於本黨領導之下，而一致努力。中國共產黨人既捐棄成見，確認國家獨立與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唯望其真誠一致，實踐其宣言所舉之諸點，更望其在禦侮救亡統一指揮之下，人人貢獻能力與國家，與全國同胞一致奮鬥，以完成國民革命之使命。總之，中國立國原則爲總理創製之三民主義，此爲無可動搖無可移易者，中國民族既已一致覺醒，絕對團結，自必堅守不偏不倚之國策，集中整個民族之力量，自衛自助，以抵抗暴敵，挽救危亡，中國不但爲保障國家民族之生存而抗戰，亦爲保持世界和平與國際信義而奮鬥，世界明達之士，必能深切瞭解之也。」（念六年九月念三日）

一、中國共產黨爲實行三民主義，放棄暴動政 策，摒絕赤化運動，取銷蘇維埃組織與紅 軍，團結抗日宣言

親愛的同胞們！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謹以極大的熱忱，向我全國父老兄弟諸姑姐妹宣言：當此國難極端嚴重，民族生命存亡絕續之時，我們爲着挽救祖國的危亡，在和平統一團結禦侮的基礎上，已經獲得了中國國民黨的諒解，而決心共赴國難了，這對於我們偉大的中華民族前途，有着怎麼重大的意義啊！因爲大家都知道，在民族生命危急萬狀的現在，只有我們民族內部的團結，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現在全民族團結的基礎已經定下了，我們民族的獨立，自由解放的前提也已創設了，中共中央特爲我們民族的光明燦爛的前途慶賀。

不過我們知道，要把這個民族的光輝前途，變爲現實的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仍需要全國同胞，每一個熱血的黃帝子孫，堅忍不拔的努力奮鬥，中國共產

黨願乘此時機，向全國同胞提出我們奮鬥之總的目標，這就是：

(一) 爭取中華民族之獨立自由與解放，首先須切實的迅速的準備與發動民族革命抗戰，以收復失地和恢復領土主權之完整。(二) 實現民權政治，召開國民大會，以制定憲法與規定救國方針。(三) 實現全國人民之幸福與愉快的生活。首先須切實救濟災荒，安安民生，發展國防經濟，解除人民痛苦，與改善人民生活。

凡此諸項，均為中國的急需，以此懸為奮鬥之鵠的，我們相信必然獲得全國同胞之熱烈的贊助，中共願在這個總綱領的目標下，與全國同胞手携手的一致努力。

中共深切的知道，在實現這個崇高目標的前進路上，須要克服許多的障礙和困難，首先將遇到日本帝國主義的阻礙和破壞。為着取消敵人的陰謀之藉口，為着解除一切善意的懷疑者的誤會，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有披瀝自己對於民族解放事業的赤忱之必要。因此，中共中央特再鄭重向全國宣言：

(一) 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爲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爲其澈底的實現而奮鬥。

(二) 取消一切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停止以暴力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三) 取消現在的蘇維埃政府，實行民主政治，以期全國政權之統一。

(四) 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爲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統轄，並待命出動，擔任抗日前線之職責。

親愛的同胞們！本黨這種光明磊落大公無私與委曲求全的態度，早已向全國同胞在言論上行動上明白表示出來，並早已獲得同胞們的贊許。現在爲求得與中國國民黨的精誠團結，鞏固全國的和平統一，執行神聖的民族革命戰爭，我們準備把這些諾言中在形式上尚未實行的部份，如蘇區取消，紅軍改編等，立即實行，以使用統一團結的全國的力量抵抗外敵的侵略。

寇深矣！禍急矣！同胞們，起來，讓全國四萬萬同胞，更親密些團結起來罷

，我們偉大的悠久的中華民族是不可屈服的。起來爲鞏固民族的團結，爲推翻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而奮鬥，勝利是屬於我們中華民族的。抗日戰爭勝利萬歲！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萬歲！（念六年九月念二日）

三、敬告國人書

並與中共同人商榷抗戰建國諸問題 張國燾

抗戰發生，國步艱難，有識之士，僉識救亡圖存，惟有舉國一致，精誠無間，抗戰到底，始克有濟。而達到此目的之最重要條件，端賴民族意識之高度發揚，犧牲精神之百倍提高。本人於四月初自廣施到達西安時，適得讀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及抗戰建國綱領，認為深合國家民族之迫切需要，而其籲請全國人士共同奮鬥之至誠，亦復溢於言表，尤深感激，因即離陝來漢，冀與此間中共中央負責諸君詳為商討，期於抗戰建國事業，更作進一步之最善努力；不意商討未竟，即受中共中央開除黨籍之處分，並造種種謠言（如加本人以對抗戰民族統一戰線表示不信任，對中國革命表示絕望，並進行破壞抗日團體等不經之詞），當即就本人政治意見，簡略有所聲明，其要點有四：

（一）本人素具抗戰到底之堅強決心，和抗戰必勝之堅強信心，對於中國抗

戰之光明前途，並無絲毫失望；本人更願貢獻一切，為國家民族效力。

(二) 當此國家民族危急存亡關頭，本人認定國家民族高於一切。

(三) 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中國國民黨為主持抗戰建國大計之領導中心，蔣先生為全國唯一之最高領袖，此三點中共中央亦不否認；中共中央主張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方針，自是中共中央的進步，本人亦表贊成，但深覺如此還是不夠，因主張中共中央對於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和抗戰建國綱領應即為更懇切之響應，以達更進一步之精誠團結和增強抗戰建國力量之目的。

(四) 本人曾本上列主張，用至誠態度，與中共中央諸君初步商討，未蒙採納，今後仍望中共諸同人，對於本人上列主張，深切考慮。

上之簡略申明，本人自信對於當前政治需要，尚無不合之處。乃近見武漢中共負責人公表函件，對於本人主張與行動，續有詆誹，綜其所述，無非蔑棄正理，偏執已見，甚至不惜虛構事實，顛倒是非，以遂其抹殺政治商討，維護局部利益之私圖。如此，足徵中共負責諸君，對於近代政黨黨員應具之自尊心，未甚重

視，政治道德，亦鮮顯及，此本人深為惋惜者也。

當茲抗戰建國之嚴重關頭，本人深信每一政治戰士在國家民族至上之原則下，均有放棄過去一切成見，端正其政治趨向之必要，並應全國上下精誠團結，努力完成復興民族之大業。據此觀點，願就本人與中共間政治上分歧之點，因此而引起之爭論，略陳梗概，邦人君子與中共諸君幸垂察焉。

關於中共政治路線之全般檢討，因範圍過廣，此處暫勿深論，僅就目前整個民族迫切需要之抗戰建國基本觀點，加以考察，本人確切相信中共政策錯誤之發生及其過程，實非偶然，而且這一錯誤過程直到今日還未停止，這是本人不敢苟同的主要所在。

中共政策路線，向來是環繞着一個錯誤軸心而轉動，這個錯誤軸心的構成，可從下列諸點，加以簡略說明：

第一，中國原是一個經濟落後的被帝國主義侵略的國家，散漫的農業為組成國民經濟的骨幹，純民族工業的比重，頗為低下，因此革命的任務，對內是剷除

封建殘餘，改正土地關係，完成國家的統一，對外是廢除帝國主義在中國境內之經濟特權與政治特權，爭取領土主權之完全獨立自主；這是國民革命的主要內容。關於這一點，在中山先生與越飛君的聯合宣言上說得最清楚；「孫逸仙博士以爲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因中國並無使此項共產制度或蘇維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況也。此項見解，越飛君完全同感，且以爲中國最要緊急之問題，乃在民國的統一之成功，與完全國家的獨立之獲得」。概括言之，中國革命的性質是全民性的國民革命，任務是內求統一，外求獨立，而就革命動力言，城市市民與鄉村中小地主及自耕農都佔極少數量，這些階層對外積極反對侵略，對內並不代表妨礙統一之封建勢力，所以除去封建的舊勢力而外，廣大國民羣衆都是這一革命的積極參加者和擁護者。

中國共產黨雖亦見到這些基本問題，而並沒有深切的瞭解，因此，經常以急進的主觀上的幻想，代替中國社會發表之客觀條件，機械地了解民主革命的陣容，只有循着蘇聯十月革命的惟一途徑。更錯誤的是不瞭解革命客觀形勢，基此而採

用諸多錯誤政策，客觀上對於可能參加的廣大革命力量，竟予以過當的摧折，直至九一八民族危險之嚴重性明顯呈現時，仍是如此，而今天亦未曾表裏一致地改正過來。

復次，中國國民黨領導之對內統一運動，其目的原為反對封建割據，亦係形成全民對外之先決條件，應當確認為進步的合法步驟。中共昧於此議，貿然將階級鬥爭和民族解放，勉強地予以聯系，並強調階級鬥爭愈深入，民族解放愈迫切成功之說，處處以階級利益抹殺民族利益。這一切與國民革命不能調和之基本觀點在理論與事實兩方面，均已確正其誤。

第二，以上是說明中共對於國民革命理論的錯誤見解；基於此種見解，於是對於中國國民黨之認識，亦極不正確。中共初則認三民主義為反動思想體系，而認國民黨祇是代表地主資本家的階級政黨，繼又認國民黨為法西斯主義之分派，國民政府為親日賣國政府，但就三民主義的本質言，就國民黨組成成份而言，就國民政府及蔣先生之過去政策而言，此諸估計顯非事實。中國國民黨實繼承中國

革命史上之優良傳統，他推翻滿清專制政府，創立中華民國，北伐後逐漸完成統一中國的任務，迄今尙担任神聖抗戰建國的重任。即以此次抗戰而論，舉國上下，一致奮起，爲中國歷史上所僅見，將士犧牲者，爲數在五十萬以上，尤復再接再厲，此諸明顯事實，無論何人，均不得不承認此爲蔣先生領導成功之明證，國民黨的精神發揚之實例。尤有進者，蔣先生爲舉國一致所公認之最高領袖，當此國本飄搖千鈞一髮之際，挺身肩負此民族興亡之重責，忠誠謀國，中外同欽，凡我國人均不應藉口某些枝節問題，吹毛求疵，別謀發展，以快私圖，所以那些主張國民黨具有兩面性，在目前抗戰是革命的，抗戰勝利後是不革命的謬誤觀點，不僅是否認由抗戰勝利而展開之革命光輝，而且對於正在進展中的抗戰建國之偉大工作，亦必然予以嚴重損害，此則可以斷言者。

第三，中共對於中國革命之錯誤判斷，對於三民主義國民黨及其領袖之固執成見，於斯形成其一般策略路線的連串錯誤，中共本身組織缺陷與退化，亦隨此錯誤路線而益充分暴露出來。

中共策略路線錯誤之具體表現，即爲不顧革命所需要的客觀條件而爭取領導權的鬥爭，自民國十六年以來，中央更提出蘇維埃政權口號，採取以鄉村包圍城市的暴動政策，爭取所謂一省數省首先勝利，十年以來，現已證明，所謂蘇維埃口號，完全與民族利益背道而馳。就共產黨本身而言，牠久已退出產業區域，走向偏遠地帶失其應有之羣衆基礎，牠已起了質的變化，已經不是什麼無產階級的政黨，而以農民佔多數的小資產階級的集團，不斷的在進行軍事陰謀與暴動，以從事持久的阻撓內求統一與外抗強敵的鬥爭。

第四，抗戰發動以後，全民族之迫切要求爲精誠團結，一致抗日，中共主張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形式上改編紅軍，取銷蘇維埃政權，停止土地革命，表示服從中央政令，但實際上仍然因循其固有錯誤思想與派別成見，嚴格維護其小組織的利益，因而減弱現階段抗戰建國的神聖工作。自中共牢不可破的成見看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兩個以上不同政治團體的暫時聯合，此政治團體乃基於其社會基礎之不同而所代表之階級利益亦異，國民黨是代表地主資本家的政黨，共產

黨是代表無產階級的政黨，兩者間之利害畢竟是不能調和的，這裏便隱藏着過去歷史重複的根源。吾人近來習聞的中共宣傳，有所謂「共同領導，共同負責，共同發展，共同綱領」等說話，仍不免是一種爭取領導權之陳舊思想，毫無放大眼光以維護國家民族利益爲己任之氣魄，保存實力，保持邊區政府與某些游擊區域的特殊地位，以徐圖發展，乃其真正目的所在，抗日合作不過爲達到此目的宣傳手段。據中共之意見，所謂民族統一戰線，諸凡與其意見相左之抗日份子，皆放在統一戰線之外，而一切打倒，所謂合作，凡中央政府管轄之地皆任其作誤謬宣傳，而陝北邊區，則視外人租界封鎖尤嚴，如斯作法，豈以爲人盡可欺耶？竊意中共諸君如果承認國家民族利益高於一切，與目前民族危機的嚴重，統一意志抗戰建國之萬分必要，則應毅然決然放棄這些成見與作法。開誠布公，與國人相見，亡羊補牢，猶未爲晚。

根據上面的分析，本人站在抗戰建國的基本觀點上，願作下列提議，希望中共同人予以善意考慮。

第一，中共同人，只有在確認國家民族利益高於一切之原則下，真誠擁護蔣先生領導的抗戰建國運動，毫無保留地實行三民主義，務必言行合一，不再作與此違反的宣傳和組織，基此立場，中共同人應自動破除門戶之見，泯滅界限，與國民黨黨員同在蔣先生領導之下携手同進。

第二，無論在任何情況之下，國家政權和軍隊應完全統一。第八路軍，奮勇殺敵，深為國人所贊許，但望中共同人能根本破除「抗日聯軍」之成見，使八路軍國軍化，如此一面可增強抗戰建國力量，減少一切不必要之顧慮，一面於彼此融化之過程中，互相交換經驗，則今後裨益抗戰實力，當非淺鮮。邊區既不可當作中共之根據地，也不應形成特殊區域，更不宜自定法律，深閉固拒，排除異己，效法軍閥割據，總之邊區政府現已無存在之必要，應即還政中央，以昭大信於天下。在中共所領導之游擊區域，亦應秉承中央，充分發揮其抗戰作用。

第三，一致站在國家民族的立場上，從事實踐中央之外交政策。

以上三點，即本人前次申明所謂「更進一步之精神團結」的具體內容。

本人與中共歷史關係甚深，由於近二十年之經驗教訓，愈使我深刻地理解中共政策不當，尤其是抗戰發生以來，國家民族危如累卵，更不願躬視此錯誤政策之繼續存在。猶憶民國二十四年夏毛澤東領導之一方面軍與本人所領導之四方面軍在川西會合時，當時曾發生不同意見，毛澤東等估計長征是勝利，主張應北進出陝西，形成川陝甘根據地，重建所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本人彼時估計長征是失敗，一省數省首先勝利前途早成過去，吾人應在川西和西康地域或甘肅西北部之甘涼肅一帶，首先求得與中央軍之休戰，再圖舉國一致抗日方針之實現。因為兩種主張未能一致，遂致形成中共之分裂。是年十二月間，由於共產國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之決定，遂使此種爭論漸次減少，終於形成一，二，四方面軍在陝的會合。

本人到達陝北時，恰是西安事變前十天，西安事變是由於中共「抗日反蔣」之宣傳主張而來，其實質則係軍事陰謀，本人事先并未與聞，西安事變發生後，延安方面中共負責諸人均不免有情感衝動之主張，當時特別衝動者，另有人在，

事實昭然，當可覆案，嗣後決定採取和平方針，本人與中共其他負責人均一致贊成。而且基於此項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方針，使本人與毛澤東的意見接近起來，這是一貫的事實。於此見中共公表文件所謂本人當時堅決主張內戰方針之說，完全是別有企圖之造謠。在這一期間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本人曾在原則上表示完全贊成，但認為更須澈底執行。方能挽救民族於危亡，因而認中共彼時所執行仍感不夠。

由於統一戰線方針，致使本人與毛澤東等的意見接近起來；又因為毛澤東等對於此政策之執行，仍係深懷成見貌合神離之作法，致使本人深為不滿，特別是抗戰發動後，毛澤東等所保持的獨立自主，別立門戶，不以國家民族為重之精神，引起本人與毛澤東等之間，許多爭執。故此次毅然離開延安，來到武漢，這完全是基於共赴國難之堅強信念，光明正大之舉動；中共同人原無所用其疑慮。乃中共負責人不加深察，對於本人此次參加抗戰建國之積極行動，妄肆攻擊，橫加壓蔑，充分發揮其非政治的，偏狹自私的，陰謀煽諂的宣傳，企圖對內壓制中共

黨內之自我批評，對外敵視一切擁護中央領導，努力參加抗戰建國之份子，凡此一切，均可視為中共對於團結抗戰缺乏誠感之表示，至於其刻持本人之種種非法企圖，原屬陳周秦等少數人之無理舉動，識者自有公論，不足深辯。

總之，本人自弱冠以來，目擊國勢凌夷，奮起救國，不計其他。獻身革命，垂二十年，對於中共政策之形成未能及時糾正，自然亦負有某些連帶責任。然生平言論行動，素為國人共見共聞，此次舉動，純出愛國至誠。為愛護中共同人，更為愛護中國革命起見，本人亦誠披瀝所抱之見解，深願社會人士予以明察，更願中共同人本自我批評之精神，棄文過飾非之謬習，憬然自悟，糾正中共現行一般政策之錯誤，在國家民族至上之原則下，努力抗戰建國，庶中國革命大業，迅底於成，此不僅個人之幸，抑全體民族之福也。（民國二十七年五月六日）

四、中華民族革命同盟解散宣言

中華民族革命同盟，係李濟琛，陳銘樞，蔡廷楷，蔣光鼐，陳友仁，徐謙等倡導組織，以抗日救國爲號召。自盧溝橋及上海事變發生後，在蔣委員長領導下，中央政府已發動偉大之全面抗戰，該同盟認爲當前全國民衆，均應各盡其力，擁護政府，在最高領袖領導之下抗戰，方能達到最後勝利，故於昨日發表宣言，正式解散同盟之組織，茲錄其宣言如下：

我中華民族革命同盟之成立，其目的端在促進全民族力量之集中，對日抗戰，以達到中國之獨立自由平等。自盧溝橋及上海事變發生後，全國在蔣委員長領導下，毅然作神聖之自衛戰爭，我民族已呈現空前未有之統一。在此偉大民族戰爭逐步展開之時，吾人應本公誠之態度，共求民族統一之鞏固，促進全民抗戰之成功，故於八月發表宣言，號召內外盟員及全國同胞全體動員，各盡其力，擁護政府，抗戰到底，復於十月二十五日經最高會議議決，正式解散中華民族革命同

盟之組織。吾人深信此種光榮表示，足以增強全民族團結之信念，我海內外同盟組織，一律結束後，所有力量，自當貢獻政府，效力抗戰，以貫徹吾人之素志。所望全體盟員，此後各自淬厲，本歷年抗戰之決心，作民族忠貞之戰士。並望我政府在此存亡一髮之秋，積極動員全國民衆，共赴此神聖之民族戰爭，以爭取最後勝利，完成民族解放之使命，實現民有民治民享之國家。謹此宣言。

(二十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五、國家社會黨張君勸致蔣汪總裁函

介石總裁精衛副總裁賜鑒：本月三日中國國民黨臨時代表大會宣言，舉詩經嘷鳴求友之義，昭示海內，同人等捧讀之下，忉然有動，不敢不勉竭愚誠，冀贊盛業。同人等以爲一國人民言行之所不能逃者，厥爲歷史上遺留之民族性。吾國聖賢之宇宙觀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惟其心目中注意之方而多，故不好爲一偏與排他之論。反之，最近歐洲各國政局，常有有我無他之象。立足於無產階級者，不容資本家之存在；立足於個人自由者，不顧及全社會之幸福。以是黨派對立與其相殘之酷，頗有爲我東方人所不克瞭解者矣。中山先生奔走革命以還，舉民族民權民生三者爲立國要義，主張個人自由而不忘社會公福，主張民族本位而不忘世界大同，其於採用西方政制，固一貫以吾國民族性於其中矣。今之持共產說者，漸自階級立場轉而努力於民族生存；持集權說者，亦知法西斯主義難行於中土，此吾民族性不走極端而好調和之明證也。惟吾國有

此民族性，故言治術則儒法同進，言宗教則釋道並尊，未嘗有如歐洲之相排相殘，此實吾民族含宏廣大之優點，而應謀所以保存之而發揮之者。此次大會宣言即爲代表此種中庸性之重要文獻。語云和氣致祥，吾國而有此氣象其民族性本然之表現，同時即爲復興之朕兆，有何疑乎？同人等鑒於十餘年來青年惟務外馳，竟忘國本，乃標國家社會主義且組織國家社會黨以矯正之。昔年曾刊布「我們要說的話」一篇，臚舉各項主義，內容繁複，非一函所能詳。然吾人之言，與中山先生遺教有若合符節者，茲舉三點言之，以資參證。

第一，國家民族本位 吾輩政綱中曾有語云，「吾們相信民族觀念是人類中最強的，階級觀念決不能與之相抗，無論是已往的歷史，抑是目前的事象，凡民族利害一達到高度，無不立刻沖破了階級的界限。日本人壓迫吾們到這種地步，雖平日在對抗中的資本家與勞工，亦都不由得不聯合一氣，從事於抵抗。所以民族觀念是深中於人心，而較階級爲強。只有民族的縱斷，能沖破階級的橫斷，却未有階級的橫斷，能推測民族的聯合。即以蘇俄論，他的成功處不在階級鬥爭的

國際化，只在社會主義的民族化。」

第二，修正的民主政治 吾輩政綱中曾有語云：「吾們所想出的修正的擬案是什麼，首先可說的便是必須建立一種政治制度。在原則上完全合乎民主政治的精神，在實施上必須使黨派的操縱作用不能有所憑藉，於是這種政制在平時不拘兩黨或多黨都能運用，即假定無黨亦可運用，而在緊急時候，立刻可以集中全民的意思與力量，不分黨派，我們相信這樣制度是不能創造的。」

但歐戰之後，批評民主政治者往往而見，如今之意德等國，竟目民主政治為惡劣政治。同人等以為政治的社會之要素，不外乎二，其屬於國家者為權力，其屬於個人者為自由，為行政之敏捷與夫應急之處置計，不能不抬高權力；為個人之自發自動與養成自己負責心計，不能不許以言論結社之自由，地方自治與夫參政大權。惟有此等權利，而後人民有實際上參預政治之機會，而後知輿論界議場上政府中言論之不可以苟發，而高調與笑罵之無濟於事。蓋民主政治之下，人民得真正參加政策之決定，其責任心自養成，其政治智識自增進，及至國難臨頭，

尤貴乎事權之統一與執行之敏捷。彼此同心一德，以最高權力託之於戰時政府。可見正惟平日民主政治之實行，及至戰時，人民自然感覺權力集中之必要。如歐戰時之各民主國之戰時內閣，皆其彰明較著者也。

第三，社會主義 關於經濟制度，同人期望社會主義之實現，政綱中曾有語云：「（一）爲個人謀生存之安全，並改進其智能與境况計，確認私有財產。（二）爲社會謀公共幸福，並發展民族經濟與調劑私人經濟計，確立公有財產。（三）不論私有與公有，全國經濟須在國家制定之計劃下，由國家與私人分別擔任而貫徹之。（四）依國家計劃，使私有財產趨於平衡與普遍，俾得人人有產而無貧富懸殊之象。（五）國家爲遺產之效率增加及國防作用計，得以公道原則和平方法移轉吸收私人生產或其餘值，以爲民族經濟擴充之資本。」

自此三點觀之，可知同人等之主張與中山先生民族民生之三大主義措詞容有不同，而精神則並無二致。良以中山先生之三大要義，固已確定吾國立國之大經，而莫能出其範圍。「然立說內容間有出入，則以政象因時而異，藥石自難

盡同，此環境使之然也。」况衡諸抗戰建國綱領二十六條，在抗戰期間不違反三民主義最高原則及法令範圍內，對於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當予以合法之充分保障云云，則政府態度與在野黨派所要求不謀而合。在同人等自當爲開心見誠，以國家社會黨之主張行動，向公等公開而說明之。願政治不獨限於若干項之大綱，尙有因時因地因事而生之問題，非今日所能預測。同人等更願本精神團結共赴國難之意旨，與國民黨領導政局之事實，遇事商承，以期抗戰期中言行之一致。此同人等願爲公等確實聲明者也。更有進者，方今民族存亡，間不容髮，除萬衆一心對於國民政府一致擁護而外，別無起死回生之途，吾輩同志之中，有參加民元之革命者，與反對洪憲之帝制者，平日自命爲對於中山先生創建民國之工作，亦嘗負弩前驅，因此愛護民國之心尤爲深切，則處今日強寇方張僭竊潛起之際，尤當追隨公等之後，鞏固主權，保全國土，使中華民國長保昔日之光榮，且得今後之自由發展，此亦同人等區區志趣所存，當蒙鑒察者也。特佈肺腑，惟祈亮照。專此敬勸安。國家社會黨代表張勳君拜啓，四月十三日。

六、蔣汪總裁復函

君勵先生惠鑒：頃誦來書，承示所有主張與三民主義最高原則在精神上並無二致，今後更願本精誠團結共赴國難之旨，遇事商承，以期抗戰期中言行之一致，而於擁護政府維繫民國尤拳拳致意，語重心長，至爲敬佩，而態度之坦白，情意之懇摯，尤見謀國之忠，憂時之切，實深欣慰。中國國民黨對於抗戰建國之大計與期望，已具於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本黨同人念國難之方殷，責任之未盡，在國民大會未召集以前，自當竭其心力，勉負責任。更望全國賢智之士，或加入本黨，共同負荷，或秉持共信，一致努力，俾捍禦外侮復興民族之使命，得以早日完成。凡此熱忱，定荷垂察。至言論出版結社集會之自由，抗戰建國綱領第二十六條既已確定其範圍，並加以保障，自今以後，惟當本此方針，共相策勉，庶幾同心同德，弘濟艱難，國家民族前途光明有繫於此。掬誠奉復，諸祈鑒察，專此敬候台安。蔣中正汪兆銘謹啓。

四月十五日

七、中國青年黨左舜生致蔣汪總裁函

介石精衛先生惠鑒：敬啓者，國難尚在極嚴重之階級中，中國青年黨同人雖堅信長期抗戰最後勝利必屬於我，但在目前，則尚不敢即以輕忽之心，遽弛其戒慎之念。國民黨最近所發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及抗戰建國綱領，同人等曾詳細閱讀，並以極端之善意迎之。深信苟能斟酌緩急先後，逐一見諸實行，必與國家有益。中山先生畢生奮鬥之目的，其一在爭取中華民國之自由平等，此次國民黨領導全國抗戰，即此遺教精神之具體發揮。其一在建國必以憲政爲指歸，此次國民黨臨時代表大會在此非常時期不忘國民參政機關之建立，國民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之保障，亦即異日憲政實施之端緒。與同人等夙昔主張之國家主義民主政治，適當符合，願表示甚深之敬佩。國民政府爲今日舉國共認之政府，亦即抗戰唯一之中心力量，同人等必本愛國亦誠，始終擁護。中山先生謂三民主義爲救國主義。如公等認同人等夙所主張無背於救國之原則，俾同人等十五年來所慘淡

經營之一集團，在抗戰建國過程中得盡其最善之努力，庶於國家前途能有較大之貢獻。同人等唯認定國家至上，故在過去十五年中，雖對政治不負任何直接責任，而愛護國家終始不渝，補徧救弊，未嘗因環境艱難而稍懈其努力。至其成績如何，固不欲自爲陳述。總之，同人等觀目前之艱鉅，念來日之大難，僅有與國民黨共患難之一念，此外都非所計及；僅知國家不能不團結以求共保，此外亦無所企圖。坦率直陳，力求實踐，耿耿之懷，敬候明教。此頌助安。

中國青年黨代表左舜生謹啓。 四月二十一日

八、蔣汪總裁覆函

舜生先生惠鑒：展誦來書，承示對於國家前途之觀察，思深慮遠，至切欽佩。并承示及夙昔主張與本黨總理孫先生畢生奮鬥之目的相符合，抑示擁護政府之赤誠，願為抗戰建國而盡最善之努力，誠摯坦直，矢共艱難，循誦之餘，彌深感慰。本黨對於抗戰建國大計與期望，已具詳於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與抗戰建國綱領。責任所在，無可旁貸，而實踐之功，必資羣力。今日舉國共同之期望，唯在攘外除侮實現三民主義以救國。本黨念職責之艱鉅，尤望集中全國賢智之心思才力，以共濟此日之艱危，而謀國家久遠之福利。苟斬向之從同，必團結而無間，此願共同勉者也。輒因來書，布具誠款，即惟鑒察，祇候台綏。

蔣中正汪兆銘謹啓

四月二十四日。

九、京滬蘇浙旅居武漢文化界同人對時局共

同意見

——我們只有一個信仰。一個政府。一個領袖——

十年來國民革命的目標，即在建設統一的近代國家，再對國際求民族的獨立。最近向日本帝國主義軍事侵略的抗戰，其基礎力量便建築在甫具雛形的統一上面。日本帝國主義所以急轉直下的向我國猛烈進攻，亦即因為我國統一建設的大功告成，妨礙了它的侵略進程。自「蘆溝橋事變」以來，於今已逾五月。在這五月餘，英勇的民族戰士，不論任何省區，不論任何部隊，都把槍口向外對敵以描準，前仆後繼地作壯烈的犧牲，這確是統一對於軍事動員的貢獻。精神動員是總動員的推進機，也必須充分表現統一的精神，然後才能加強抗戰的力量。基此信念，我們認為在長期抗戰感到挫折的過程中，對內更應力求統一，以答復敵國的繼續侵略。我們基本的觀念，是：

- (一) 一個信仰——思想的統一；
- (二) 一個政府——組織的統一；
- (三) 一個領袖——行動的統一。

三民主義是建國的最高原則，是救中國的唯一主義，也是我們對敵人思想戰最犀利的武器。在五十年來的國民革命的進程中，雖然有不少人對它懷疑，破壞，污蔑，但它畢竟是唯一的真理，每經一次困阻，即愈顯其光芒，而且更得到廣大的信仰。這一次的統一告成，便是因為舉國對於三民主義信仰的集中。信仰是一種力量，信仰的集中更是一種偉大的力量；而求力量的堅固，尤須對於主義有真摯的一貫的信仰。有了精誠專一的信仰，才能產生一心一德的力量。其次，我們所應接受的是孫中山先生全部的遺教，是整個的不是片段的，是系統的不是割裂的；以重要性來說，必須以三民主義，建國大綱，建國方略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為中心，而後不至有儒分墨離之弊；以永久性來說，必須主義重於政綱，政綱重於政策，而後不至有周納曲解之害。更次，三民主義的實行，是循序

漸進的，現階段的三民主義的實施方案，在民族主義方面是國防建設，在民權主義方面是民主建設，在民生主義方面是經濟建設，實言之，就是一貫的自力更生國策。在應戰以前，固會集中力量，循此途徑以備戰；在應戰以後，更應喚起民衆，循此途徑以增厚長期抗戰的力量。反之，一切破壞自力之幼稚的，盲動的，離心的，反科學的行動，無異就是自殺，皆應絕對避免。至在國際方面，則尤應依照「損之至我」的原則，多方聯絡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以期多得與國，以爲自力的外應。

國民政府是依據人民代表集會所製定的訓政時期約法而組成。約法與製定約法的『國民會議』，都是孫先生遺教的實行，而約法更是唯一的最高的具有尊嚴性的根本法。所以政府的組織，絕對不能違反約法的規定；而政府法令的制定，尤須尊重立法的程序。再國民政府是綜攬全國治權的唯一最高政府，也就是國家統一的寄託。國民對於政府的法令，有服從的義務，在戰時更應嚴格的遵守。敵人侵略我國的方法，是企圖先將我國分裂爲若干部分，然後逐漸吞滅；所以欲樹立

若干傀儡組織，從破破我國統一入手，來謀顛覆國民政府的政權。我們應誓死反對國民政府以外任何偽組織，並堅決地認為憑藉任何外力扶植以成的偽政府，都是帝國主義及漢奸的產物，而鬻緣奔走供其頤指氣使者，更是奴才的奴才。且以爲國民政府的統治權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凡一切割據封建的行動，足以破壞治權的統一性，就是破壞國家的統一，也就是助敵資敵。又，政府爲求增厚抗戰力量，應再延攬人才，集中人才，使組織更健全，更充實。但是我們所希望羅致的人才，是具有民族道德，有氣節風骨的，不是譁世取寵，團團亂轉的；是爲國家民族謀利益的，不是爲個人或黨派謀私利的；是能苦幹實幹的，不是清談空論的。

民族獨立運動的成功，無不資賴偉大的領袖之領導。蔣委員長是我們唯一的最高的領袖，也是政府賦予全責，而爲國人所一致竭誠擁戴的。他是 孫中山先生的唯一繼承者，他嘗遍了種種的艱苦，他打破了種種的困阻，他創造了統一的國家，他更在建立獨立自由的國家。第一，領袖不但愛國情緒較任何人爲熱烈，才識較任何人爲卓越，而且因爲一切情報的總匯合，行動的總指揮，他對現實問

題的瞭解與認識，也較任何人爲周詳而正確。所以任何人對於領袖的主張，都應絕對服從，決不能存有絲毫懷疑或非難的心理。第二，國民革命的成功，不是一蹴而成。求民族自由獨立的獲得，須先忍受得住挫折中的苦痛。國家在正常狀態時，我們固應對領袖矢維護之忱，但在艱辛危險之中，尤應更矢忠勇，服從命令，而後方能加強行動統一的力量，以獲取最後的勝利。將個人的自由貢獻給領袖，就是貢獻給國家民族，也就是使國家民族能夠到更大的自由。

我們的基本信條，是國家民族的利益高於一切個人，團體，黨派，區域或階級的利益；我們的行動準則，是每一個國民都應在工作救國的原則之下，各竭盡其智能，對國家民族爲最大限度的貢獻。愛國固應有熱烈的情緒，但更需要有理智，有秩序；抗敵固然應扶植民衆，但更宜培養民力，發揮民力。我們決不可因敵人更嚴重的壓迫，存畏葸苟且之心，或懷怨望離貳之念；而我們對於自己的團結，應更隨嚴重壓迫而益臻堅固。鞏固團結的不二法門，就是基於統一國家的信念，要對三民主義真誠堅毅的信仰，對國民政府真誠堅毅的擁護，對蔣委員長真誠堅毅的服從！

卜僂吾，卜儀吾，丁叔明，丁超，水心，仇河清，王平陵，王步青，王殿卿，王漢中，王馨圃，江標，任西萍，石信嘉，甘豫源，白動生，向世南，朱元懋，朱鏡堅，朱錦江，東天民，沈亦珍，宋鼎，邢好仁，何瑞琪，沙雁，汪寄宙，貝有麟，李祖廉，李超英，李清棟，余仲英，林廣，林美衍，周尙，周華，周伊武，周瑩，周厚樞，周德華，柯像峯，胡考，胡杰人，姚蓬子，姚駿程，馬客談，施仁政，俞浩，徐伯申，徐長錦，徐楓吟，高璘度，高蟄蘇，袁莊伯，袁野秋，唐盧鋒，章柳泉，陶百川，莫萱元，陸步青，許蟠雲，張平，張常人，張明潔，張鎬，張清泉，張通謨，張錦鴻，曹芻，黃汝昌，黃淑芳，黃其炳，黃懋蓀，賈書法，章啓華，童潤之，程祥榮，曾濟寬，華林，郭法周，孫亞夫，彭爾康，喻鑑清，喬一乾，項學儒，詹絜悟，楊公達，楊叔虞，楊若思，楊家駱，葉淺予，葉溯中，葛建時，趙堂構，劉百閔，劉國鈞，劉壽祥，劉漢良，薛德炯，薛德楨，錢少華，謝繼曾，謝雲驥，鍾人傑，譚振民，濮明之，蘇淵雷，鄒仲廉。

民國廿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抗戰建國叢書

第一種

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
大會宣言及抗戰建國綱領

(附輿論一斑)

第二種

最後勝利的把握

(以上兩種每册定價國

幣壹角)

大眾的抗戰讀物 **老百姓** 旬刊

每册定價貳分

金華各大書局及全國各
大書局均有經售

浙江省抗日自衛委員會戰時
教育文化事業委員會編印

抗戰建國叢書
革命領導權(全一册)

定價國幣壹角

執筆者 葉溯中等

主編者

浙江省抗日自衛委員會
戰時教育文化事業委員會徵編組

發行者

浙江省抗日自衛委員會
戰時教育文化事業委員會

印刷者

東南日報印刷股

經售處

各地各大書局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七月初版

573
44f0.55

3C
3.74
1/2